致萨德的信

卡特里奥娜·塞思 编；多位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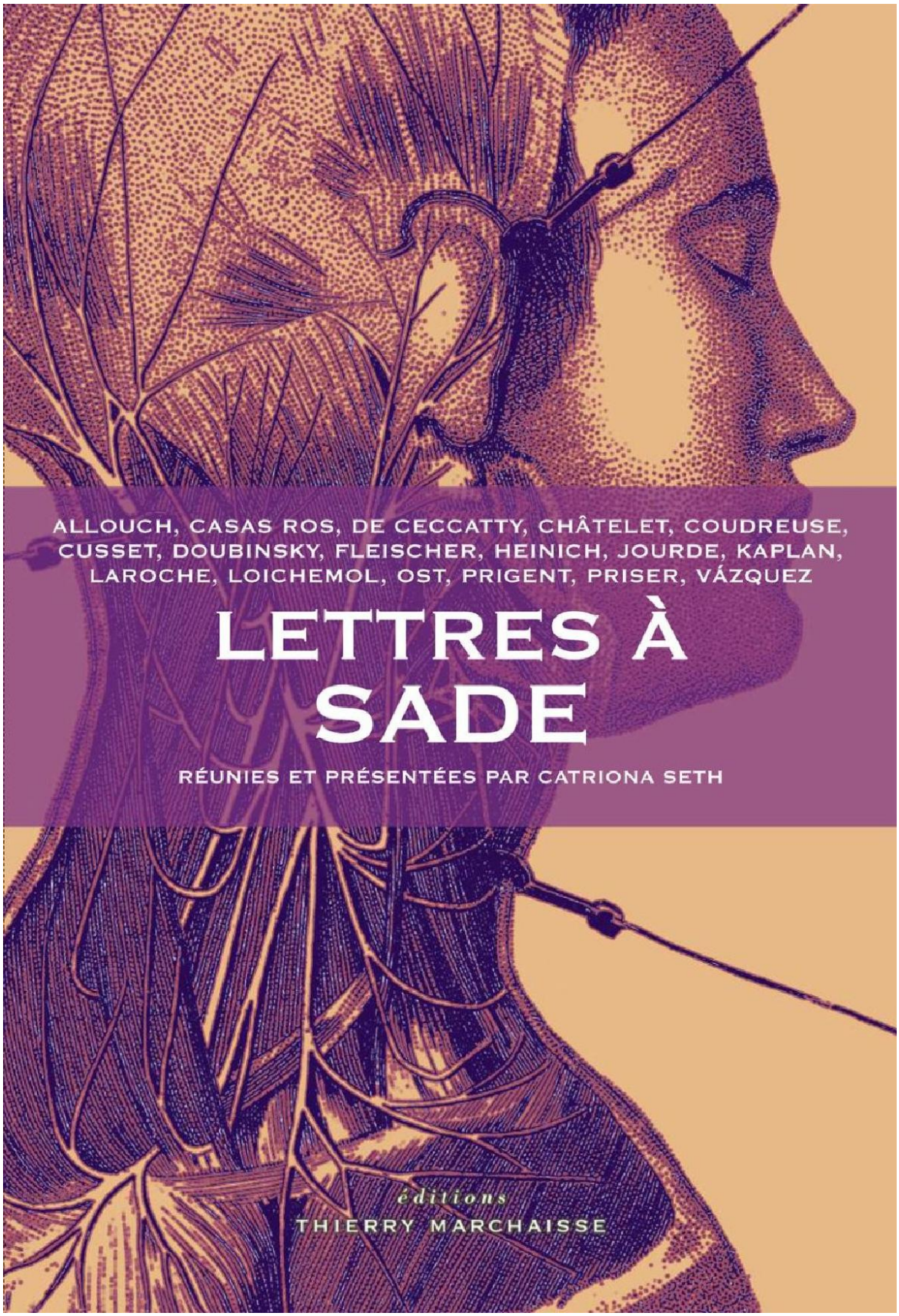
中文阅读版 · 2026年10月5日校订稿

据用户所给法语电子文件的中文译稿导出。正文、图版、编号原注和相邻译注均保留。底本缺页、缺图和不可辨文字沿用校订稿中的说明。

目录

封面 3
“致……的信”丛书 4
书名页 5
出版资料 7
序曲 8
献词 9
萨德侯爵之死的悼文 10
自由 14
皮埃尔·茹尔德 15
克里斯蒂安·普里让 17
弗朗索瓦·普里泽 21
勒内·德·塞卡蒂 27
阿兰·弗莱舍 29
塞巴斯蒂安·杜宾斯基 33
现代性 35
阿德里安·拉罗什 36
卡特琳·居塞 41
安东尼·卡萨斯·罗斯 45
娜塔莉·埃尼克 48
莱斯利·卡普兰 50
诸永恒 54
安娜·库德勒兹 55
埃尔韦·卢瓦什莫尔 58
让·阿卢什 59
弗朗索瓦·奥斯特 64
诺埃尔·夏特莱 69
莉迪亚·巴斯克斯 71
作者简介 75
同社出版物 79
法定呈缴 81
封底 82

封面


ALLOUCH, CASAS ROS, DE CECCATTY, CHÂTELET, COUDREUSE,
CUSSET, DOUBINSKY, FLEISCHER, HEINICH, JOURDE, KAPLAN,
LAROCHE, LOICHEMOL, OST, PRIGENT, PRISER, VÁZQUEZ
LETTRES À SADE
RÉUNIES ET PRÉSENTÉES PAR CATRIONA SETH
éditions
THIERRY MARCHAISSE

“致……的信”丛书

“致……书信”丛书

曾有一个时代，通信是时事、思想冲突、同自身的关系、同同时代人乃至同古人的关系之主要媒介（*medium*）。那时，书信像剑一样交错，被公开朗读，被誊抄，在一只只手之间流通。如今，这种短小、亲密、有所致送的形式，淹没在我们电子短笺不息的洪流之中，然而它并未丧失其论战力量，也未丧失其文学之美。本丛书愿在二十一世纪的公共论辩中，重新把它应有的位置全部归还给它。

书名页

致萨德的信

由卡特里奥娜·塞思汇集并介绍

让·阿卢什

安东尼·卡萨斯·罗斯

勒内·德·塞卡蒂

诺埃尔·夏特莱

安娜·库德勒兹

卡特琳·居塞

塞巴斯蒂安·杜宾斯基

阿兰·弗莱舍

娜塔莉·埃尼克

皮埃尔·茹尔德

莱斯利・卡普兰

阿德里安・拉罗什

埃尔韦・卢瓦什莫尔

弗朗索瓦・奥斯特

克里斯蒂安・普里让

弗朗索瓦・普里泽

莉迪亚・巴斯克斯



éditions
THIERRY MARCHAISSE

出版资料

© 2014 蒂埃里·马尔凯斯出版社

视觉设计：德尼·库肖

内文排版：安娜·弗拉戈纳尔-勒冈

蒂埃里·马尔凯斯出版社

迪德罗街 221 号

94300 万塞讷

http://www.editions-marchaisse.fr



马尔凯斯



EditionsTM

发行-经销：Harmonia Mundi

ISBN（ePub）：978-2-36280-058-0

ISBN（纸质版）：978-2-36280-057-3

序曲

序曲

献词

献给菲利普，他与天使共进晚餐，也许并未同萨德侯爵交谈，却在称赞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品味，称赞布弗莱骑士的才智，向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表达他对她肖像画的钦佩，也向安德烈·勒诺特表达他对凡尔赛花坛与树丛园林的赞赏。

萨德侯爵之死的悼文

悼萨德侯爵之死

在埃佩尔农附近、埃芒塞，在今天的伊夫林省，一个地名“马尔梅松”，见证着此地昔日曾有一所麻风病院，传染病患者在那里得到医治，也被逐出社会。那里曾有一座砂岩庄园，两侧带有砖砌小塔，饰有带壁柱的栏杆，并被一圈设防围墙的遗迹环绕。从旧城堡一侧进入，沿着将其分开的宽阔林荫道前行，便会碰上茂密的灌木丛。在右侧第一片灌木丛里，邻近的农夫应当挖出一个坑穴。在勒诺尔芒先生的监督下，一具尸体应当被安放在那里；勒诺尔芒先生是在凡尔赛平等街营业的木材商人，特地被传唤来监督这项葬礼任务。那是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在青灰色的天空下，没有任何特别仪式。覆盖遗骸的泥土上，不应播撒那些在一堆粪肥上被摘落花瓣的玫瑰，而应只是撒上橡实，以便随后该坑穴所在地重新长满植物，灌木丛仍如从前那样茂密。没有任何东西应让人猜出，是谁的残骸就这样在法兰西岛一个安静角落里分解。没有石碑标明地点：坟墓的痕迹应当从大地表面消失，正如死者的记忆注定要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

莫里斯·海涅于1932年前往此地。他又同乔治·巴塔耶一道重返那里，而后者随后又将带米歇尔·莱里斯前往。他们的朝圣之旅引向一个本应成为他们中一员、一位作家的埋葬之处的地方，如果他的家族尊重他于1806年1月在沙朗通精神病院写下的遗嘱安排的话；那时他“理智健全、身体健康”，六十五岁，仍在马尔梅松拥有一处农庄产业，却已不再是拉科斯特城堡的领主，那座宏伟的普罗旺斯鹰巢已于1796年出售。显然，他并不知道，在他预先拒绝的遗骸解剖研究——“我禁止打开我的身体，无论以任何借口”——之后，接踵而来的将是持续两个世纪、且很可能还会继续下去的，对其著作的解剖；至少是对那些他已经出版的作品，或逃过其道貌岸然的后代焚书之举的作品的解剖，这些后代因这位父亲和祖先过于奔放的想象、令人不安的诱惑力而处处感到尴尬。他笔下的摘录，有时貌似已被抚平缓和的摘录，或整部作品，出现在教科书中、公共图书馆的书架上、大学研读课程里，这究竟是一种加冕，还是历史的一次讽刺性眨眼？而那些自称共和的国家，仍继续审查一位死去两个世纪的作者，这究竟是承认必须以异常严肃的态度接纳他的著作，还是仅仅证明民主的系统性不连贯？此人的存在动荡曾撼动一个处于革命中的世界；他的书是否揭示了一些裂缝，而西方良知的灰浆难以将其遮蔽？

多纳西安-阿尔丰斯-弗朗索瓦·德·萨德，旧日的伯爵或侯爵，后来成为普通公民，一度担任长矛区代表，在被旧制度司法缩减为一个编号——六号先生——之后，他是否害怕被活埋？他似乎曾有这种对“仓促下葬”的恐惧，甚至超过某种恋尸癖的幻象；苏珊娜·内克尔曾以此为题发表著述。事实上，他“以最强烈的坚持”要求，他死后遗体须在停尸房中保留四十八小时，然后才可钉上棺材。这个曾面对种种危险、曾因爱情想要自杀、曾因行为过度被君主制判处死刑、又因温和主义被革命者判处死刑的人，如今不再设想在一张床之外咽下最后一口气，仿佛唯有临终痛苦才能抵抗其视野的无度。随后，他意欲将一具完整的身体交付泥土，使其在土中分解。然而，尽管其遗嘱安排如此规定，萨德的身体与记忆都没有消失。《朱丽叶的故事》（*Histoire de Juliette*）为犯罪辩护，认为犯罪有益，并前来保证：没有什么会死亡：“你可以改变形式，但你不可能将其消灭；你不可能吸收物质的元素：而你又

怎能毁灭它们，既然它们是永恒的？你改变它们的形式，使它们变化；但这种溶解服务于自然，因为正是用这些被毁坏的部分，自然才重新组合。”无序在小说与幻想的坩埚中变形：思想的碎片、瓦解的话语、新的情绪，便这样从曾经存在之物的巨大虚无中涌现出一些文本，而这些文本都带着阅读萨德作品所烙下的印记。

许多文学的测绘者都曾同那位被反语赋予“神圣”这一修饰语的人走上一段路；反语还给了他一个头衔，即侯爵，而他其实并不怎么使用这个头衔。他们以支撑在深渊之上的不可能梦想，来补偿自己对平庸的拒绝、对怪异作为无穷快乐之源的选择。得益于超现实主义者最后的火光，复活的萨德（Sade *redivivus*）获得了一场在各方面都堪称卓异的葬礼盛典，《执行萨德侯爵的遗嘱》（*L’Exécution du testament du marquis de Sade*），这是魁北克人让·伯努瓦的一场独一无二的表演：他身穿奇装异服，在巴黎拉着一辆手推车。面对围观者的提问，他回答说自己名叫勒诺尔芒先生，完成自己的任务已经迟到一个半世纪以上。因此，必须让他毫无阻碍地继续他的行程。此行应在乔伊斯·曼苏尔家达到高潮，即朗读《闺房哲学》（*La Philosophie dans le boudoir*）作者那份未被执行的遗嘱。这场壮观的化装闹剧本身就是一件作品，其高潮之一，是在1959年12月2日，即这位作家逝世145周年纪念日，以赎罪姿态，用烧至白热的烙铁在这位加拿大艺术家的心脏部位皮肤上烙下萨德本人的名字；关于这一切，没有留下录音，也没有留下除若干服装摆拍照之外的照片。

萨德是超现实主义者的黑天使；这些超现实主义者标举他身上精美的野蛮与凶猛的自由渴望，意欲把他们锋利的笔浸入污秽与鲜血混合的墨水瓶中。萨德挑战死亡，成为那些人的牢房同伴：他们的精神被囚禁于巴士底狱，他们的灵魂受创；或者，他们竭力用梦的罗网捕捉日常生活的人造眩晕。他被奉为永恒的挑衅者，依旧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名字本身已成为一种被经历的丑闻以及其他潜在丑闻的终极表达，击碎所有栅栏；他能够把给予死亡作为至高姿态，用以证明自己仍然活着。他的人权宣言，一部倒错的福音书，一部卑劣行为史，一份罪行目录，同时也是偏见和陈词滥调的火刑堆，必然会在显要位置纳入一项非人性的权利，并想象一种永恒的组合机制；这种机制只有到那些被奉上的身体、被夺取的身体、被征服的身体、被支配的身体出现不可能的耗尽时，才可能停止，肉体重新落在肉体之上。

在残酷的先贤祠里，人们找到了命名那些在暴力中最为精致的行为的方式。自克拉夫特-埃宾以来，施虐者就成了一种类型；克拉夫特-埃宾致力于给驱力分类，并以一种组织性逻辑给可能的偏离者的恶习贴标签，而锡林的女史学家们或许会赞赏这种逻辑。萨德是我们赋予自己幻想的名字，是我们对自身那些难以承担的不完美、不可告人的欲望、我们自身幽暗部分的意识；这个名字令人想起一个头脑的发明，这头脑在其错乱中堪称天才，能够生出最可怕的人物，而法语便是它唯一的祖国。致信萨德，这是否就是写给无人，是否就是呼喊、声嘶力竭地叫喊，在一个唯有回声可能提供可笑的回答姿态的沙漠里，上气不接下气？

作为一切悖论之人，萨德，这位兄弟或永恒的他者，既不属于精神科医生，即那些重新发现他的灵魂医师，也不属于大学学者，即那些对他的便条和戏剧、小说、对话和短篇，以及那卷详列恶行的卷轴作博学阐释的人；这卷恶行有时以昆虫学家的冷峻，细列癖好与气质、简单的激情、双重的激情、犯罪的激情与杀人的激情。他招募崇拜者，也招募批判性的读者；这些读者被他的文本改变，也知道同这些文本保持恰当距离，能够阅读它们，而不把它们活出来，并且分布在不同领域。只有一个领域，他会愿意与之结盟，那就是文人。正是向他们，我们发出邀请，请他们开启或重启与他的对话，以标

记一次死亡的第二个百年；对于这次死亡，尽管他的后人或许不悦，“消失”这一委婉说法也不能充当同义词。每个人都选择了如何同萨德说话，以及同他谈些什么：谈一个共同的过去、一个不可理解的现在、一个遭否认的未来。以文学作为呼吸，以语言作为自由，无论它清晰得令人炫目，还是探入人类存在的最深处，话语都可以开始。

有些书信作者发问：若生活在2014年，这位神圣的侯爵难道不会拍电影吗？而面对电视摄影棚里一位淫荡主持人的好奇，他又会作何回答？另一个人则自问，他会如何评判我们走向极端的个人主义；面对近些年来仇恨的汹涌浪潮，他是否会组织孤独的示威，谴责一切生殖——哪怕是自然生殖。对于我们的世界，萨德——经由一名受托委员之手，对热气球和其他航空静力机器颇为着迷——有人向他介绍社会学、代孕母亲，以及一长串私密穿孔，其名称听起来就像昔日名妓用来遮掩梅毒瘢痕以及其他瑕疵的那些放肆的“mouches”（美人痣/苍蝇）的名字，而危险的铅白妆面具也只能让这些瑕疵隐约可见。[注]

人们从阿维尼翁、巴黎、艾克斯或西米亚讷-拉罗通德给他写信，也从巴塞罗那、圣布里厄或纽约给他写信；有生日贺词，也有写给一个两百岁捣乱者的绝交信。约会被重新经历、被约定或被取消，地点在巴士底狱、在沙朗通、在意大利的道路上。人们要求来自墓外的答复，有时也收到了。幽默与心绪，深度与激情，内在性与陶醉，放弃与慰藉，疯狂与闪光，恋曲与决裂，遗忘与记忆，样样都有。在其中，人摸不着头脑（直译：丢了自己的拉丁文），又重新理清头绪（直译：找回自己的小崽子们）。人自命亲手牵动线索；人从幕后离开舞台，放弃这座颠覆性剧场脚灯炫目之光所带来的盲目，在那里，人永远只是群众演员。人告别一种背叛性的忧郁；人一起进入永恒，俯身倚在一座短暂影子剧场的阳台上。人物走出书页，并与这位显赫囚徒的亲近者们结合在一起——他们或是黑暗的猎手，或是虚幻黎明的不耐守望者——一时间又回来萦绕读者的想象——你、我，或萨德本人——并栖居于其他作家的作品中；这些作家在其中找到一种柔顺可塑或坚如金刚石的材料，可以镶嵌进新的叙事之中。作为一件不可思议的遗物，神圣侯爵的颅骨脱离了他的身体；它没有滚入群星，也没有在天国的火山中引发猛烈喷发，而是在文本与精神之间前行，寻找一种失落的绝对。

> [注] mouche 通常指“苍蝇”，也指旧时贴在脸上的装饰小贴片或“美人痣”；此句把私密穿孔的名称同旧时交际花遮住梅毒疤痕的 mouches 相连。中文保留这两层词义及其滑稽语气。

萨德家族没有选择让他归于一片橡树林地的异教虚无，而是宁愿为他举行一场平淡无奇的宗教葬礼，试图让这个人至少凭借死亡回到规范之中；这个人之所以有界限，只是为了越过界限，之所以有原则，只是为了反击他人的原则，而那些人的天真幻觉让人相信，美德会兴旺，恶行会不幸；这个人把自己的贵族出身看作一张无可辩驳的空白授权书，是通往哪怕最极端行为的唯一护照——尤其是通往最极端行为。墓穴之上，并没有竖起刻有死者姓名或纹章的石碑，也没有立起镌有教化性墓志铭的石头，而是一座无名十字架，这是一个“可憎的骗子司铎乌合之众”对这样一个临终者的最后报复；他们曾声称要同这些临终者对话，靠的是甜腻的话语、不确定的许诺和诱人上当的威胁。墓地本身也注定要消失；这并不是为了实现它最著名的居住者曾如此坚定表达过的愿望，即以一片植树地作为庇护之场，而是为了在新的围墙后面——那里黑色太阳刺射着光芒——接纳一代又一代病人，他们内在的创伤有时仍不可治愈。

在奥恩省的埃绍富尔，一座墓葬纪念碑仍向过路人请求为两位既有美德又仁慈的女士“灵魂的安息”祈祷：洛尔-玛德莱娜·德·萨德，以及她的母亲，“勒内-佩拉吉·德·蒙特勒伊，萨德侯爵夫人”。她们的丈夫与父亲的记忆在别处。人们无法把萨德关进一座坟墓：若身体的腐烂不可避免，精神却仍然留存。人们可以崇拜他或憎恨他，钦佩他或把他公开唾骂（直译：献给热莫尼阶梯）。人们必须承认，他经由文本施加于那些他视为软弱存在者的人身上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暴力——尤其是施加于那么多女人身上的暴力；人们也不能不向这位深渊的预见者致意。人们无法无视萨德。正如他的著作曾使巴士底狱的高墙龟裂，并推倒其他内在的壁垒，它们也使其作者在死后两个世纪仍然活着，越过了赋予人类的时间边界。无论个人自由的掘墓人曾经想要什么——并且有时至今仍想要什么——这些著作都不可能被埋入土中，或在图书馆那些被遗忘的二流书架上腐烂。

卡特里奥娜·塞思

自由

自由

皮埃尔·茹尔德

– 皮埃尔·茹尔德 –

亲爱的侯爵，

我想要向您致谢。只要您的书继续流通，它们就会是我们对抗那些淡而无味的情色花草茶的一种依靠。人们继续用所谓色情的粗俗、它缺乏审美来烦扰我们，而情色，不是吗，那可就好多了，艺术得多，升华得多。那些可预料的词语来了，像一颗颗串起来的珍珠：暗示、神秘、影射，等等。每次我听到这些，我就又看见大卫·汉密尔顿从前到处散布的那些穿着飘逸长裙的仙女们的模糊照片。还有一点点可爱极了的小乳房，一点点光滑极了的小屁股。令人作呕的糕点。某种类似庸俗学院派画家笔下的维纳斯的东西。您教给我们的，不是色情，而是性的凶猛。对性的成瘾。欲望的重复性、强迫性。在您那里，人不开玩笑，不装高尚灵魂，不做漂亮心肠和屁股审美家。您向我们展示了性中有多少死亡欲望、多少毁灭性驱力。您向我们展示了，无法满足的欲望若要走到自身的尽头，就必须毁灭它的对象。您并没有发明鞭子的欢乐，您那个时代的放荡者们大量使用它。但在您那里，它不再是一种可亲的前戏、一种热身。它自足于自身。它不再仅仅是肉体的，它也是哲学的。它不仅用来把玫瑰掺入娇嫩肉体的百合之中（我借用您的话，您意象的寡淡同叙事的残酷构成一种可喜的反差），而是用来把一个人囚禁在施加给他的痛苦之中，使他服从于一个欲望，而他不过是这个欲望的对象，在他的身体上标记出他受奴役的符号。当然，占有的狂热不能止步于此。还需要其他折磨，然后是死亡。

而这一切又穿插着推理和论证。当然，折磨服务于您的论证，作为例子。但我最终对自己说，这也应当以相反的方向运作。您的论证向您的受害者宣告那条铁一般的法则，根据这条法则，他们将被献祭。而我很清楚，侯爵，像您这样的人深知法则之陈述那种猛烈的情色性质。词语占有欲望的对象，就像它们所宣告的惩罚一样确凿。它们穿透他，并使他屈服。而您的法则之所以更加严苛，是因为对您而言，它不是人的法则：它是自然法则。

您在两次打屁股之间作出的那些泰然自若的论证，也许构成了一种性哲学的第一个例子。在您之前，我们所能得到的，只是关于爱情的没完没了的论文。是的，我相信，您是第一个理解到，在一个被鞭梢抽出条纹的漂亮臀部里，牵涉到的是一种世界观，甚至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人。还请允许我再次感谢您，因为您成了某种倒转的卢梭。必须有一种解药，用来抵御那个瑞士人的感伤狡诈，他声称人自然是善的。您的残酷不仅采取了与那位孤独漫步者相反的立场，它们还说出了他的隐秘真相：人确实是孤独的，但孤独得如此绝对，以至于他人对他而言只是猎物。波德莱尔理解了您：恶与自然同质共存。不过我还是会看到您同他之间的一个差异：波德莱尔相信善与恶。您只相信恶。在我看来，侯爵，那么也就不再真正有恶，而是一种中性的力量，命令我们去毁灭。您在其中看到自然循环中的一个环节，自然毁灭只是为了重新组合。若您允许我这么说，这里有一种唯物主义动力学的形式，在我看来有点过时。您不知道熵。在某种物质观上，您因乐观而犯错。

您很少有软弱之处，这必须承认。我想向您在情色狂症中的执拗致敬。什么都不能削弱您的狂热，巴士底狱不能，疯人收容所也不能，而您无法再亲身经历的东西，您就在您的四壁之内不停地书写，像某种色情文学的普鲁斯特。但我很难理解您一度倾向于雅各宾派的时刻，那些德性的典范，那些布鲁图斯。毫无疑问，是无神论的希望吸引您走向他们。但他们也需要一个神。

侯爵，您如此费力想要论证的东西，我一点也不相信。而恐怕没有人真正相信。您有点太教条了。这就是这类理论的不便之处，而您的那种唯我论也是如此，就像贝克莱的唯心主义一样：它看起来令人信服，但人无法相信它。况且这也并不十分重要。理论的崩塌丝毫不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您已经决定性地把文学与善分离开来。或者至少，更准确地说，您的作品构成了文学与伦理关系中的一个关键时刻。

侯爵，我们的时代，以它自己的方式，已经变得比您的时代更加贞谨。一些协会或知识分子想要禁止他们认为不道德、不人道或危害儿童的文本。与此同时，您的作品，以袖珍版的形式，陈列在书店里，人人伸手可及。您也许并不知道。我心想，这会让您发笑。

皮埃尔·茹尔德

克里斯蒂安・普里让

– 克里斯蒂安・普里让 –

圣布里厄，2014 年 3 月

致萨德先生

S. 侯爵先生，自从我读您以来（已经半个世纪了！），您的一句话就纠缠着我：“无论人们会因此战栗到何种地步，哲学都必须说出一切。”这句话很有名。还有许多人引用过它。我喜欢它那种既带玩味又阴郁的傲慢。我喜欢它那种大贵族的腔调。我甚至喜欢其中听得见的那一点颤音般的咕咕低鸣。

这完全就是您。

这简直就是您本人，*6 号先生*，在您的某座监狱里，隔着如此编号的牢房铁栏向世界喊话。

有人劝我给您写信。我这就来了。同一句话又回到我这里。它听起来依旧准确。但久而久之，它的意义变得晦暗了。必须“说出一切”。好吧。但您所谓的*一切*是什么意思？凡是*存在*者的总体？一种被总体化的“自然[注1]”经验？

> [注1] 在卢克莱修的意义上（*rerum natura*，实在）。不是田园意义上的*自然*（树林、乡野和天空）——古斯塔夫·福楼拜谈到您时说，您厌恶自然，并且在您那里“没有一棵树，也没有一只动物”（龚古尔兄弟在他们的《日记》中记载，日期为 1860 年 1 月 29 日）。

说到自然，正好，我们来谈谈它。

要知道您对它究竟怎么想，并不容易。

我又一次翻阅您的《闺房里的哲学》（*Philosophie dans le boudoir*）。其中自然常常受到赞美：我们绝不可侮辱它的“目的”，不可侵犯它的“权利”，“凡是同自然的法律相抵触的人类法律，都只配遭到蔑视”，等等。

人们简直会以为听见了今天那些反对婚姻平权（同性婚姻）、反对堕胎权、反对医学辅助生殖的人：所有这些东西，就其反自然而言，都是污秽之物。

只不过，在这个场合被您安排来说话的，是颇不天主教的圣昂热夫人。对您而言，自然的目的同 *La Manif pour tous*（“全民游行”，法国反同性婚姻运动）[注2] 的蒙昧主义自然主义所信奉的东西毫无关系。它也并不更等同于生态主义天使主义所膜拜的那些蠢话。对您而言，自然，就是野蛮的东西，残酷的东西。您问道，除了它的声音，还有哪一种声音“向我们提示个人的仇恨、复仇、战争，总之，提示所有这些永恒谋杀的动机”？

> [注2] 您或许会说他们是些“傻瓜”：他们“愚蠢地把社会制度当作自然的神圣法律”。

这无疑是漫画式的。但它把事情重新摆正了。也重新框定了我刚才提到的那些蒙昧主义理由。因为困境如下：按照自然生活吧（但那样一来，就让我们崇拜盗窃、杀人、通奸、强奸、乱伦）；或者：让我们恐惧地拒绝这些罪行并惩罚它们（但由此，也要同样驳斥那条向我们建议这些罪行的自然法）。

此外，您那挑衅性的逻辑有时也会支持后一种立场（有时同相反意见仅相隔很少几页）：在同一本书里，您的多尔芒塞就在这里；面对年轻的欧仁妮，一个相当放荡的女学生，他称赞鸡奸（这可以避免不合时宜的怀孕）；他说："以这种方式违抗傻瓜们所谓的自然法律，实在充满诱惑。"

总得弄明白才行。



还有更糟的。

让我们再次听听圣昂热："人类种族的彻底灭绝只会是对自然所作的一项服务。"这个断言很难反驳。对于一个被人类活动蹂躏的自然而言，最好的事情，确实就是这些人赶紧滚蛋。

然而这是把事情推得有点太远了。无论如何，已经足够远，以至于这个陈述虽说无懈可击，却无法维持。那些声称为了自然之善而行动的人类，并不因此就渴望看见自己的种族灭绝。他们越是以对大地的偶像崇拜式虔敬而自鸣得意，就越不是如此。即便号召"保卫自然"并不只是自然主义信仰这种非思想形式的一种效果，它也往往只属于一种广告或政治算计[注3]。一点历史知识甚至本该提醒我们，至少同生态敏感的民主派一样，那些最有潜在杀人性的政治也惯于如此。

> [注3] "宁要大地，不要笛卡尔"，几年前曾是一位年轻而出色的部长竞选里昂市长时的选举口号。

阅读您，亲爱的侯爵，或许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种习惯从何而来，以及它为什么延续。

但我们再说回来。

圣昂热所说的是常识——然而又荒谬。它同时无懈可击又无法维持。这多少扰乱了实证理性。您非常喜欢撩拨这种理性：无懈可击和无法维持，常常是您那种特殊逻辑的两个属性，彼此难以分开。您使那些既不可争辩（理性必须向其屈服）又不可适用（在被生活的生活中，没有这些真理的位置）的陈述成倍增殖。于是，您的著作便在我们的思想中打开了某种*黑洞*。它们提示说，理性者有一种他异性——而这个*他者*却丝毫不必同非理性有关。它们假定，在理性上可命名者的这边或那边，有一种不可命名者的力量——但对这种力量的承认，在您那里却并不属于一种不可言说者的神秘主义。它们记录了一个未被言说的*差异*对我们并在我们之中的压力。这个差异，您肯定它是物质性的。您把它安置在有性身体之中，作为常住之物。您向我们描述它正在强行开辟通往言语表象的通道。但这是为了表明，它只有作为扰动力量、作为对象征界的异议，才进入象征界：逻辑僵局、疑难、沉默、痛苦或享乐的喊叫。

"非逻辑的差异"，乔治·巴塔耶把它称为：*物质*。安托南·阿尔托也是如此——他使*物质*和*感性*等价[注4]。归根到底，这或许就是您称作*自然*的同一个东西。无论如何，您的激情，就是触及它。但这是作为这样一种触及：它对于一种无矛盾的哲学理性而言是不可触及的。而您的信念，如果我正确理解了

您的话，就是只有闪耀着幽默的矛盾修辞式或疑难式陈述，才能够表象它的差距。于是，圣昂热的答话以自己的方式，便成了利希滕贝格那句著名格言（“一把没有刀刃且缺少刀柄的刀”）的等价物：它拥有命名不可命名者的力量，像那句格言一样，它当场凝固出一幅对“无懈可击/无法维持”这对组合的揶揄形象，像那句格言一样，它说出一个*不可能的*公式，照字面把理性炸开[注5]。

[注4] 见“栅栏对敏感性、物质而言是一场可怕的考验”（安托南·阿尔托，《全集》，巴黎，伽利玛，1976 年，第 I 卷，第 109 页）。

[注5] 这一段经少许修改，移自我的文章《一根粗大的上蜡红线》（收入《不可遏制者》，巴黎，POL，2004 年，第 61-63 页）。

对于这一跃——跃出杀人的自然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列——怎样感谢您都不为过。

我回到您那道要*说出一切*的命令。它向“哲学”发出挑战。这个词又反过来成了问题。如果把它等同于智识话语和笛卡尔式理性，那么这个挑战就是疯狂的。但我注意到，在您那里，正如在您那个时代许多其他人那里一样，“哲学”更像是指我这个时代称作“文学”的东西。事实上，您并没有写哲学论文，而是写了*小说*，往往是对话体小说，在其中展开哲学。那些哲学陈述，您把它们放进人物口中，而这些人物只不过是思想的形象。如果其中说出了一切，那是作为并非实证地可说之物而说出的。一方面，它在人物之间对话的乒乓往返（视角的多样性）中被表象出来；另一方面，尤其是在您的哲学展开那种逻辑冷峻与前来使逻辑哑口无言的性场景之炽热之间的交替中被表象出来，而这种交替不可还原为任何统一性。

换言之，如果“总体”经验在其中构成为被言说的真理，那既不在理性展开之中（知识、理性、概念陈述——一种“例子”的美学），也不在色情小说的纯粹过度之中（非知识的推进、非理性、沸腾的享乐、具身的语言——一种“动人/触及”的美学）。如果有真理，它是在两者之间的交替凹处所打开的那个不可*说*的空洞中裸露出来。

最后，这就是我从您的装置中保留下来的东西：一切并不被“说出”，而是在戏剧性地取消说话本身之可能性的小说结构中*以否定方式形成*。并且，它之所以作为“一切”而形成，只是因为它*包含*这种取消，包含这个言说思想的悬置。在这里，我再次听见您的多尔芒塞。他被刚刚说出的色情话语弄得过度兴奋，并被它们带到失语的边缘，此刻他喊道：“啊！操！操！完了，我受不了了！”他由此把经验的*总体*真理，*第一*，认同为言语对实践的召唤/挑动（是说话使实在涌现），*第二*，认同为言语的耗竭，言语突然被认出为不可能，并被字面上*无-中介*的实践短路（是实在挑战并拆解言语）。没有这个被投放到逻辑装置核心中的双重的、矛盾的和毁灭性的运动，就没有对“一切”的*呈现*。

结论：“说出”和“一切”是相互对立的。“说出一切”是一个矛盾修辞。那么必须作出这个赌注：一切（“实在”）那令人恐惧的窸窣声，只有在某些文学虚构记录下来的幽灵般回声中才能被听见。正是这个赌注，您促使我们坚持。而您的虚构自身也坚持着它，在其中，有性肉身的压力把思想推到一个怪物般涌现的边缘——而这涌现使思想悬置，使它当场凝固。

这种由一种思想造成的可思之物的悬置，是决定性的；这种思想被那召唤/挑动它的不可思之物所萦绕，*因为这个不可思之物居住在它之中*。也正是因为您执拗地把这种居住及其后果搬上舞台，我最后必须为此感谢您。

您的著作构成了一种人的形象，它同那种基础理性以及虔敬的道德主义毫无关系，而所谓的人文主义太常常就被缩减为这些东西。它们提出的问题既不只是道德问题，也不是时势性的政治问题，更不是能够从头到尾被哲学理性所征用、所管辖的问题。这些是关于人的根本问题，关于人如何投身于他的语言之中——投身于在语言中由他而成、又由他而重新生成的东西之中。关于*总体*之人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人在*自身之内*包含非人。您的文本不断显示这一点，它们甚至就是对这一证明的奇妙反复咀嚼：不仅人可以是非人的，而且非人乃是人之专属。附记（您喜欢把手指按在这个恼人的点上）：成为充分的人的权利，显然并不延伸到这样一种权利，即通过*成为非人*而真正成为人。

我们确实需要这些提醒性的针刺。因为如今我们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被指派给那些被虔敬地自然化了的人的表象：被卫生化、被简化、讲求绩效、从头到尾被社会化的人，被天使般地指派给正确思想的人，被技术征用的人，大脑被交给商业理性支配的人——服从的人，首先是通过他在意识形态压力下为自己造出的自我形象，服从于那些*隐微的*总体性事业；这些事业今天正在编织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制性。我们几乎已经无法再想象另一种空间、另一种人的形象：更稠密、更暧昧、更桀骜、更有思想。支配是超强有力的。它懂得用常识的外观来装点自己（把自己否认为意识形态）。它几乎到处都已经成功地强加了这样一种观念：*没有替代方案*；除了这个被矫正、被碎片化、被洗净、被幼稚化、被缩减为他所拥有之物的反映的人之外，并不存在另一种人；除了让这种反映被当成自在的实在的社会模型之外，并不存在另一种社会模型。单纯理性的言说，正面的政治论证（连同它所亏欠于人的形象之理想化的一切），都会撞上这种被自然化的意象和这种经济上的伪常识，因为它们是在同一地面上传播的，面对它没有任何深层区分和根本后撤的可能。

为了实施这种*退距*，并维持一种瞥见*差异*之可能性的机会，我们剩下的，是乌托邦的想象机器。也就是说，是被思考为偏离装置的虚构；相对于这些装置的过度，那被称作“现实”的无法忍受的世界中的一切，都可以在思想的残酷距离中被观察，可以显明为经过计算、经过建构、在意识形态上被操纵并且操纵他人的东西——并且可以被迫揭下面具：轮到它承认自己也是虚构、虚假的布景、令人异化的噩梦。这正是您一直在做的事情。您的虚构显然并不描写一个貌似可信的世界、一种可以生活的生活。它们毋宁显示，人们把自己的共和国建立在何种否认之上，建立在何种脆弱的思想之上，建立在何种摇晃的理由之上，建立在何种残缺的视野之上，建立在何种无知的法律之上。它们组成了奇妙的乌托邦。残酷的、在人类意义上非人的，编目倒错并清点罪行，把人类社会的鼻子按进它自己的屎里，并不断暴露那种制造社会契约的理性的限度；它们没有其他功能，唯有阻止人绕着圈子思考（既不让人安居于一种被实证化的理性的舒适之中，也不让人陷入同任何客观现实脱节的狂想之中）：总之，它们禁止人*不去思考*。这是不断回到它们那里的一个好理由。为了在那里找到一些理由，可以不“战栗”地思考，不计较地思考（不计算风险地思考），并找到一些机会，不让自己的脑袋被这个世界那些令人去脑化的诡计完全占领。

谨致谢意，

克里斯蒂安·普里让

弗朗索瓦·普里泽

– 弗朗索瓦·普里泽 –

庞然阁下，

如今我们都已到了星辰之上，您，在疯人之中，到了剧院的吊景架上，在舞台右侧与左侧之间；我，在气球之中，在那被我出力使之可以航行的空气里，我们能否找到足够的电力，彼此稍稍说上几句话呢?

因为确实到了向您作出这一坦白的时候：我从未见过您，然而我曾有幸为您效劳，也曾厚颜偷过您的东西；事情就是这样！我为此请求您的宽恕，并恳求您在读过我之后稍稍爱我一点。

我是画师。应当这样说，尽管我所画的东西一点也不像室内陈设的绘画。我是在剧院里操持我的行当，而当航空机器成为时尚时，人们便用我的本事去粘合帆布和纸张，用上千个纽扣和扣眼把它们联结起来，用精巧的绳网加固，涂油，涂橡胶树胶 [*原文如此*] 清漆，最后按旅行者的趣味给那些球体上色。先生，我引以为傲的是，我制作了凡尔赛那只漂亮的气球，它让圣丰、夏尔和罗贝尔诸位先生的成功相形见绌。我的荣耀虽是匿名的，却完全抵得上您的荣耀。而当您在樊尚，把您的双眼浸没在海水浴里，把香草巧克力锭塞满肚子，并关心您的护套尺寸时，我却在蒂东府邸，在世界七大奇观之间，在雷韦永先生那里招摇，要把一只后来再也无人造出的航空器装点得十分美丽，全由棉布和纸张制成，正是曾被用来制作那些载有指券承诺的票据的同一种材料；我用胶画颜料把它涂成蓝色，配以镀金装饰、阿波罗的形象和路易的首字母。9月19日清晨，为了向王后致敬，整个法国，优雅的也好，民众熙攘的也好，都看着我的气球，高如一座六层楼的房屋，带着天空有史以来运送的第一批访客升起：一只鸭子、一只绵羊和一只公鸡。这难道不启发您写一则寓言吗？林荫道上挤满了观众，从巴黎到凡尔赛的道路上布满了马车；先生，一个剧院画师还能指望比这更大的成功吗？艾蒂安·蒙戈尔菲埃本人拥抱了我，居比埃侯爵也答应给我在宫廷里安排差事。

这并不重要。在气球与剧院之间，我参与改变着世界，而世界，先生，没有什么比剧院和气球更让它喜爱的了。

正如我的某些同行也做过的那样，画师德尚、雕塑家冈德，我甚至一度贩卖小气球，仔细画得与大型升空气球一模一样，用剪成梭形并以鱼胶粘合的肠衣薄膜（baudruche）制成。我的小气球很受青睐。您知道吗，在那个时代，没有哪一场节庆不是以放飞气球告终的？每只只要3里弗尔10苏，蒙特勒伊夫人为您的孩子们买了一些9寸（pouces）的小气球，但这笔花费不值得她向您提起。是的，先生，当时没有哪一种小饰物、摆设、坠饰、集市上的小玩意儿或极奢华之物不展示一只气球。您也展示您的那一只，可您的那些风并没有把您推得多远。

同年11月，当您的臀部给您带来苦楚时，我又一次在雷韦永那里有幸为蒙戈尔菲埃兄弟效劳。我把气球画成一片蔚蓝底色，周围环绕鸢尾花和金色的黄道十二宫符号，在外壳中部画上国王的字母组合，与太阳交织在一起，底部则是一道饰带，有面具头像、花环和展翼的鹰。整个巴黎于是都能在一次崇

高的升空中看见我的绘画：先是在工厂处系留升起，最后从拉米埃特城堡自由飞行，带着第一次坐在里面的两个人，不可抵挡的皮拉特尔和达尔朗德侯爵，升到城市上空。我的朋友让-乔治·维勒使我们的荣耀不朽。那荣耀是彻底的。

伯爵，您跟我们的气球有什么相干，您这位与我们相反仍被囚禁的人？

然而热气球的时日开始屈指可数。一切都很快。易燃空气吹拂在热空气的余烬之上。蒙戈尔菲埃兄弟同夏尔和罗贝尔竞争。我没有参加杜伊勒里那次冒险。我又参加了里昂的弗莱塞勒号那次，同皮拉特尔·德·罗齐耶一起。正是我主持制作了那只由拖把棉布制成的巨大外壳，其展开面积如此辽阔，几乎相当于谷物市场；正是我用四层涂油的废纸把它裱贴起来；也正是我用一顶由绳索固定的棉布罩加衬了球体的上部。球冠是灰色的，其余部分是一种更普通的灰色，而锥体则由五彩的羊毛织物条组成。清漆的配方正如卡扎莱先生向我建议的那样：弹性树胶、蜡和松节油，各一份；棕榈膏，八分之一份；全部熔化并溶解，在火上，溶于八份经石灰精馏的松节油中。我毫不怀疑您能理解我这里的这些数字。当时到处都能看见气球，但我并未参加所有冒险，既没有参加2月2日波尔多那次，感谢上帝，也没有参加3月2日布朗夏尔在战神广场那次，那时人们刚把您转移到第二自由塔；也没有参加4月25日第戎那次，同居伊东·德·莫尔沃一起；也没有参加5月23日在我的家乡鲁昂，由又来这么一出的布朗夏尔主持的那次。我同样没有参与5月31日朗博先生在普罗旺斯艾克斯的那次，也没有参与古斯塔夫号那次，同美丽而鲁莽的蒂布勒夫人一起的那次。

总得生活下去，我不得不重新在剧院供职。尽管如此，皮拉特尔和普鲁斯特乘坐玛丽-安托瓦内特号升空时，人们又在雷韦永那里雇用了我。先生，相信我，我在那里做出了最美的气球：球冠由缝合的羊皮构成，使它呈现出美丽的石制穹顶外观，因此我没有在上面布置其他装饰。中央部分由74幅棉布布幅组成。覆盖外壳其余部分的繁茂装饰，与球冠突兀而严峻的裸露形成对照。我在上面画了国王的字母组合，也画了瑞典国王的字母组合，后者荣幸地来访我们，我在剧院常常同他擦肩而过，他的一只手臂佩着白色绶带，以纪念1772年7月19日的政变。

我让您厌烦了，但我同您的故事，伯爵先生，是在气球的故事对我而言结束的地方开始的。

皮拉特尔轻蔑、鲁莽而机会主义，但他是忠诚的。当他决定同罗曼先生乘气球横渡英吉利海峡时，我很高兴把自己置于他的指挥之下；罗曼先生我很熟，因为他是我家乡的人，而且他同他的兄弟专门研究外壳的防水性能，更何况我的报酬还翻了一倍。说实话，皮拉特尔拥有一笔可观的40,000里弗尔用于建造他的装置，而正是卡洛纳先生把这笔钱拨给了他；考虑到公共财政相当可悲的状况，先生，这就显示出人们对气球怀有多么普遍的兴趣，以及人们期望从中得到多大的用途。当时唯有您一个人对此毫无期待，您在最低处，而我们在最高处。人们在杜伊勒里宫的一间大厅里建造它。我的气球像珠宝一样镀金，“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小饰物”，有人这样讥讽。人们也讥讽那些蹩脚的诗句，他们请我把它们画在装饰之间：

卡洛纳，扶持法国人的产业，

激发才干、艺术与天才。

最后，我们的航空器安装在布洛涅，而不是加来。可是，当布朗夏尔——“现在完全可以把他看作空中航行艺术的伏尔泰”——于1785年1月7日同杰弗里斯一道率先从多佛到吉讷横渡英吉利海峡之后，人们还能指望什么呢？

您知道我们准备出发准备了多久吗？八个月，先生。许多次，人们在最后一刻把我们那不幸的机器收起来；许多次，必须修理它；我们受到风、歌谣作者和公众舆论的阻挠，又受到卡洛纳先生、荣誉和金钱的催逼。

您知道那场悲剧；6月15日，我的气球去了，随即，同它一起，一切都去了天上。于是轮到画师跌到最低处了，先生。

然而在1785年和1786年这些年里，星辰从未如此充满气球；但我无论如何都再也不想制作也不想看见气球了，因为太多恶劣的讽刺短诗嘲弄我那只布洛涅的气球，毁掉了我的名声。我的朋友雅尼内7月11日在卢森堡的不幸，更坚定了我的决定。

剧院也从未如此满座，竞争也从未如此严酷，尽管钱匣里再没有一个苏，我自己的钱匣里更少。您以为居比埃侯爵履行了他的承诺吗？问题在于，他太忙于维持他在莫尔帕街31号的小凡尔赛，拒绝见我。

只好甘心从事其他间歇性的差事，比剧院绘景更普通，却也更稳妥。我做过家务方面的服务。蒙特勒伊夫人便是那些每月雇用我两三次、以便替您跑腿的夫人之一。我当时把这些东西送到巴士底狱，在那里，人们会把它们登记并仔细列入清单，然后给我收据，由我负责立刻把收据交还给您家里；我还送过其他一千样东西，亚麻布、书籍、折封函件、小瓶、罐子、酒瓶和纸盒。为了满足您的需要，并遵照您妻子的命令，伯爵，我在巴黎四面八方奔走，跑遍各处，冒着各种天气，见鬼似地奔忙。没有一家铺子是我没有去过的；糕点铺、熟食铺、肉铺、酒商、药材商、布商、木材商、杂货铺、锁匠铺、细木工铺、香水铺、洗衣房、花店、甜酒商、纸店、袜帽店、马具铺、书店，您这位忧郁易怒的庞然大人，所有书店，首先是您的供货商梅里戈那里，还有巴黎所有图书馆；归还、借阅或购买您下订单要的那数量难以置信的著作。先生，一个人读这么多书，是可以想象的吗？凡是印在纸上的东西，还有什么您没读过？您需要一天一本书吗？作何用途？为了复仇，为了获得灵感，为了解放自己，为了娱乐您的精神，还是您的身体？

我们共同的清点之病，您的硕大无朋，是数不清那些著作的：在我为您效劳的这五年里，我把它们交到您的钥匙看守、甜腻的洛西诺特脚下；一千本肯定有，或许还有两倍。但凭上帝起誓，这个把如此疯狂数量的著作塞进脑袋里的人，他有着怎样的面孔、怎样的身体、怎样的形体：游记、寓言、道德论文、历史与哲学著作、戏剧、悲剧、喜剧、讽刺而多情的书信、小说、歌曲、故事、历书、军事历书、内阁历书、演出历书、地理地图，等等。更不用说，您塞进脑袋里的东西，也塞进了您的眼睛里；而为了把它们从过度阅读中护理过来，您还要一点用酒精净化过的、极细的皇家粉末、洗眼水、接骨木花、藏红花、药蜀葵和烧酒、杏仁露、玫瑰水、煮过的细叶芹，以及格朗让先生的其他药方。还有在您那可怜的脚上，千种软膏和糊剂，淋浴、蒸汽、毒芹膏药、*diabotanum*、维戈的 *mercurio* 膏药、鸦片软膏、菲奥拉文蒂香膏、一品脱水里的铅糖提取物。为了平息您受刺激的神经、您胃部的敏感、您的烦恼、您的刺痛、您的鼻血、您的掉牙、您可怕的郁气、您的喉咙痛、您的偏头痛、您的肠胃痛、您全身各处的瘙痒，还有什么不是必须给您施用的？止咳药治咳嗽，可可脂栓剂给您的直肠，

罂粟糖浆治您的失眠，鸦片，若不是睡莲糖浆、白罂粟的迪阿科德糖浆？为了您胸口的刺痛，要什么？葫芦糖浆，锦葵花浸剂，菝葜根煎剂，小牛肺，珍珠大麦，椰枣、枣和塞贝斯坦果？为了您的胀气绞痛，甘菊就够了吗？没有一样够得上先生的需要，您的白葡萄干含片不够，您的玫瑰蜜不够，您那杯加一撮山萝卜浸剂的牛奶不够，您的霍夫曼滴剂不够，您的斯塔特粉、您的白夏至草叶、您的药蜀葵花、紫罗兰花、虞美人花、椴树花，这个药丸、那个朱勒普糖浆、古鲁斯灵药、香蜂草和薄荷浸剂，都不够。

至于您塞进喉咙里的东西，我也同样无所不知，因为这一切都是我给您供应的，我，您忠诚的代办人、搬运人、送货人、信使、跑腿、邮差、您的夏尔巴画师、您肚皮的万能仆役、您那贪得无厌的肥硕身躯的进口商。不，先生，确然如此，没有一样够。没有一样曾经够过，您的餐桌上总要比必需的更多，比寻常的更多，比洛西诺特给您端来的那些肉馅派、腌猪肉、馅饼、小牛或羊颈肉、午间的香肠，或炖菜、时髦牛肉，或晚间的禽肉更多，而他还要再添上您向他买的上千种额外甜食。不，您还要草莓、酸樱桃、樱桃、糖煮水果、果泥酱、果酱、猪头肉冻、鹑鸟肉串、布列塔尼黄油、巧克力奶油、豆瓣菜鸡或栗子鸡、松露肥母鸡、火腿馅饼、鳗鱼或鲑鱼馅饼、萨瓦饼干或王宫的柠檬饼干、蜀葵膏片、鹧鸪、糖渍栗子、巧克力杏仁蛋糕或马德莱娜杏仁蛋糕、烤卷心菜、蛋白酥，等等。人们给您的酒，您也不要，而这人人都能理解；我给您送阿利坎特酒，它并不完美，但可以喝。可是，您的硕大无朋，您要那么多液体做什么，要吉莱先生的所有这些利口酒做什么，以至于我必须用一辆车才给您送得过去：这些覆盆子醋糖浆、这些昂代烧酒、这些博洛尼亚或土耳其的拉塔菲亚酒、普通橙花或香槟酒调橙花的、草莓和覆盆子的、樱桃和酸樱桃的、黑加仑的、青核桃皮的、榲桲的，还有所有这些烧酒，所有这些油酒和奶油酒，异国情调得如同乘气球环游大地：科特烧酒或双重蒸馏薰衣草烧酒、神圣水、英格兰方式的巴巴多斯水、七籽水、意大利水、波希米亚当归水、法尔斯堡果核水、西班牙茴香水、鹳鸟方式的维纳斯油酒、朱庇特油酒、香草油酒、丁香油酒、马耳他橙油酒、中国柠檬油酒、四黄果油酒、玫瑰油酒、印度茴香油酒、香槟酒调橙花奶油酒或覆盆子奶油酒、意大利香橼奶油酒、葡萄牙苦橙奶油酒、中国奶油酒、摩卡咖啡奶油酒、樱桃白兰地、维斯佩特罗酒、香草。

香草与马尼拉。因为仿佛这一切还总是不够，摩西先生，您同样还往屁股里塞进了一整套幻术的算术。您以为我曾经被您怎样使用那些冷杉木、乌木或玫瑰木的套匣所蒙骗吗？九英寸长，周长八英寸半，在三到四英寸高处旋紧；还有那些瓶子，大的，尺寸同里昂大主教那个一样，小一些的，袖珍的，周长六英寸，高八或九英寸，而我把它们送到您直肠的前厅。凭所有魔鬼起誓，您就着这些吞吃了多少幻象！

然后，当然，还必须伺候您的日常，给您供应小家具、靠垫、卧具、地毯、蜡烛、海绵、细沙、剪刀、胶水；您需要尺子、封蜡棒、无数册子，各种格式、质地和颜色的笔记本，羽毛笔，黑墨水和红墨水，好让您能把您的纸涂抹到时间尽头。咖啡壶、挖耳勺、小香皂、盘子、杯子、罐子、白铁漏斗、注射器盒、小卷发梳，还有花球茎，甚至钉子，您要这些做什么？还有衣物布草，六号先生，塔夫绸便帽、衬衫、手帕、罗马哔叽短裤、拖鞋、夜间束带、背心、一副副小羊驼皮手套、长礼服外套、短上衣、领巾、头箍、绣花白丝背心、麻线或棉线长袜、胸襟饰片、床单、领巾、枕套、塔夫绸或绢丝便帽、餐巾、靴子，正适合巴黎最粗壮的腿。

于是，在您困顿于巴士底狱的所有这些年里，在第二自由塔，后来又在第六自由塔，我通过物，通过所有的物，通过这巨大无朋的物来为您效劳；这些物占据着您那庞大的身体，而这身体又以一切办法忙于走出它的囚禁，那么，即使出乎一切意料，我从未见过您，并且只能去梦见您，我难道不是最适合了解您的人吗？当人们把您那个伤残仆役梅里戈从您身边撤走时——而见鬼了，为什么他偏偏要和您的书商同名？——我以为自己可以获准稍稍救助您，替您摆桌、扫地、铺床、帮您套上衬衫、给您的壁炉添柴，终于见到您。人们没有允许我。

不过，1789年5月初，我离您很近，伯爵先生，当时雷维永先生遭到如此不公的袭击，除了躲进巴士底狱保全性命以外，他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我喜欢雷维永先生，并且把稍稍为他效劳视为荣幸；我为他做了一阵子我那么长时间为您做的事；我一直进到他的房间里，那里还得稍稍布置一下。那时，我离见到您只有两指之遥。

这就是我的故事的结尾，萨德公民。7月14日，人心激动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当我得知，出乎一切意料，人们竟已在砸断吊桥的锁链时，我混入了沸腾的人群。我向您坦白，我站在于兰先生身旁，并不是出于共和信念；他曾是孔弗朗侯爵的旧仆，当时掌管着一间位于埃皮奈教区的洗衣房；而是怀着一个秘密希望，要把您连人带物一起解救出来，把您和雷维永先生救出来。

我加入了那堆恶棍，他们露出长矛的尖端，为了让头颅跳舞、砍断双手，已经准备好做任何事；我同他们一起登上名副其实的自由塔的台阶，负责从那里带出不幸的囚徒。事实上，收获很少。起义之时，监狱墙内实际上只剩下七个可怜的被拘押者：怀勒·德·米勒维尔伯爵、塔韦尼耶、索拉热伯爵，后两人都有些疯，还有四个骗子：让·勒·科雷热、让·贝沙德、让-安托万·皮雅德和贝尔纳·拉罗什，可萨德伯爵先生，毫无踪影！我不知道，您的吵闹早已使您自7月4日起被送往沙朗通。至于雷维永先生，他十五天前就离去了。

然而，我是最早打破您房间封条的人之一；我撕裂那条横贯您房门的纸带，而您曾在门的两侧盖上自己的印章。您房间里陈设的一切，没有一样是我不熟悉的，没有一样，无论您的衣物布草、您的书、您的小摆设，还是您的衣服。对您物品的洗劫还不到一个小时，就已有足足一半不见了；我发誓，先生，我什么也无法阻止，以至于我也从您那里拿了一些，只是怀着日后归还给您的希望。并不是什么很恶劣的东西：您的一个套匣，那只玫瑰木的，当初为了加工出来费了那么多麻烦；您孩子们和您妻子的粉彩画像，请容我说一句，那位女画匠并没有怎么美化她；您那座艺术剧院的平面图，是用红墨水画的；您的《索菲与德弗朗克》全稿；您的笔记本或《沉思》；若干诗稿草稿；关于贝尔吉耶神父书籍的一些笔记；您的《日记》，伯爵先生，那是一部如此凶猛的集子，以至于事实证明，这些东西最好还是留在我手中。再没有别的。我没有碰您六百本书中的任何一本。别人开始动手了，并在第二天回来，把一切彻底搜罗干净。人们把您的一切都没收了，直到那只羽毛和马鬃做的小靠垫，它如此适合您臀部的残疾。我实在不知道，那些傲慢的强盗，其中包括这个圣马克西曼的阿尔努，为什么会在空纸箱和您财物的碎片中间，留下您那只半小时沙漏安然无恙；那是几周前我给您送去的。

愿上天保佑我们，您的硕大无朋。我请求您宽恕。

我不知道，在天上，带着那永世，您是否比那二十三年囚禁期间少些受禁锢，但请相信，读到您时，人们的头脑仍然发热，而那些混账东西也从不厌倦，总是来检查您的屁股。

您的仆人，

弗朗索瓦

勒内・德・塞卡蒂

– 勒内・德・塞卡蒂 –

像一条海狗，圣父

我觉得，在同您说话时，我是在同我自身的一部分交谈，而那一部分我颇不熟悉，正如当人们不再听见自然的语言时，那推动他们的东西也是未知的；自然的语言晦暗、矛盾，总而言之，是不连贯的。那部使人们在爱情中、在亲密关系中、在家庭中和在社会中既结合又分离的伟大机器，服从于一些法则；他们错误地断定这些法则僵硬而粗略，但这些法则彼此交战。

阅读您，始终是一个巨大的慰藉之源，就像阅读彼特拉克始终是慰藉之源一样；彼特拉克是您那位祖先，诺韦的劳拉、萨德的劳拉的情人。您自己在万森或巴士底狱，甚至在沙朗通时，也曾求助于这位伟大慰藉者的韵文。您凭记忆引用这位内心酷刑的诗人。但他至少是自愿把自己封闭在他的封闭山谷里，以便在那里从容地塑造他的劳拉的幽灵；而您，却因人们未曾理解您，被强行关进千百座监狱。

但无论如何，您知道您的声音会越过铁栏回响，知道您的遐想终有一日会以应有的方式被阅读，也会像我这样来阅读：作为一本自由的手册。必须击倒那个关于灵魂、内在良知、爱情和上帝的巨大谎言，必须把人类存在的孤独剥露出来，而不必等到被遗弃之痛向失意的情人、失聪的苦修者、敬奉雕像沉默的虔信者发出信号。

伟大的慰藉者，是的，您也是，在您的绝望中，在您那种描述专制的身体以及它们从臣服中攫取的淫乐的狂怒中；而它们正是把自己所欲望的人强制置于这种臣服之下。

作为蒙特勒伊夫人及其羽翼那不懈狂怒的牺牲者，您不得不为您岳母指责您的那些幽灵般的罪行赎罪；她蓄意利用您的法官心中妓女与处女的混淆。某些不甚顾忌的父母把自己的女儿卖给您，以便从她们虚假的密告中榨取补偿，而那补偿实际上只成了您在牢房中的漫长逗留。您的放荡在您看来属于您的权利，只要您为它付了钱；而这正是给您招来不幸的致命错误。那些您称作“姑娘”的人反叛了，并控告您。正如您相信可以买卖的淫乐之自由，您也相信小说的力量，您相信戏剧的慰藉。您不相信宗教、德性、所谓自然的谎言。

自然，您知道，说的是双重语言，端看人们想从中取得什么利益。听任自身的自然，您认为，是破坏性的，并且是恶的顾问。被人类乔装改扮的自然，则组织伪善并隐藏其罪行。一切都是相对的，绝对是一种江湖骗术，您不断提醒这一点。对某人是德性的东西，对另一人便是恶习；对某人是欢愉的东西，对另一人便是巨大不幸的原因。而主要的快乐是在违犯法律中被体验到的，无论它是什么法律，因为一切法律都是任意的。

因此，人们在行动时体验到的感受，无论是享乐还是恐惧，并不说明行动本身的内容，而是说明社会看待它的方式。并没有一种良知能够指出善或恶。内在的声音是沉默的。道德并不存在。这是否意味着您是在煽动人作恶？不，您是在使恶相对化。

“在凶手身上，让我们只看见一只由不可抗拒的法则所引导的手”，您借由您的传声筒说道。我赞同您，因为凶手的责任依赖于那些攫住了他的力量，而这些力量必须被指明。问题并不是否认罪行的现实，也不是否认受害者的痛苦，而是把罪行置于力量交换的伟大无政府状态之中。在这一点上，罪犯本人也成为“自然的”。

“当人们胆敢说一个杀人犯冒犯了自然时，他们说出的是一种荒谬，其程度就像说瘟疫、战争或饥荒激怒了自然，或犯下了罪行一样：这完全是同一回事。”这句话，您把它放进了乔瓦尼·安杰洛·布拉斯基，那个恶魔般的教皇庇护六世口中；他将被波拿巴废黜。

自然有着如此多样的法则，以至于人同自然的关系等于零，他如此总结，以解释罪行的普遍性。“我们社会体系中的恶习和德性什么也不是”，庇护六世继续说道。既无出生，亦无死亡。一切都不过是“物质的作用与反作用”。这是您再次确认的唯物主义，因为您在对灵魂不朽的信仰中看见了“疯狂与虚荣的顶点”。

所以我把您比作劳拉的情人彼特拉克。因为您们二人对社会生活、它的仪式、它的法律、它的面具，都怀有同样的不信任。彼特拉克背向人群，渴望隐修，以便只向上帝说话。您的朱丽叶想要整个世界在她眼前自行毁灭。通过揭下面具，揭露那个德性秩序的虚假担保者，即罪犯庇护六世，她把梵蒂冈的畸形体系推倒在地；这发生在庇护六世事实上被法国人逐出圣彼得大教堂之前，也发生在他使教皇宝座在十八世纪最后六个月空置之前。

对您而言，人类存在被剥夺了灵魂、道德、内在生活、爱情、上帝，被封闭在自己的黑夜中。而为什么这黑夜在其恐怖中对我如此甜美？因为存在着一种孤独者的人类共同体，最终比那些同更高的、道德的和神圣的权威面对面相处的个体集合更迷人、更美丽。

留给您的只有想象力；对于身陷万森堡、巴士底狱、沙朗通收容院的您而言，想象力就是对您自身的超越；作为囚徒，您从世界那里所接收的只剩下一些“信号”，一些神秘的信息，由您那无穷的理解需要来解释：理解人类的混乱、他们专制的不义、他们自私意志的暴力，以便您建造一种缺席、空洞、虚无的乌托邦。

而我喜欢的是，您借朱丽叶之中介，构想了关于圣父的这幅画像：“布拉斯基身体发胖，他的屁股肥厚、结实而丰满，但由于他惯于挨鞭子，屁股变得如此坚硬、长满老茧，以至于针尖也无法比刺入鲛鲨皮更能刺进去；他的屁眼大得惊人，而这又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呢，既然他惯于每天让人操二十五或三十下？他的鸡巴一旦竖起，并非没有美感，它干瘦、有筋力，龟头充分外露，长度可有八英寸，周长六英寸。”

在黑夜尽头，对朱丽叶而言，也因此对您而言，“她”将在否认上帝时射精。

勒内·德·塞卡蒂

阿兰・弗莱舍

– 阿兰・弗莱舍 –

亲爱的多纳西安，

我要用“你”来称呼你，并不是像那个可憎的马雷督察那样；当他抓住你时，他喊道：“我抓住你了，你再也逃不掉了，该死的侯爵！”而更像你的仆人拉图尔那样；当你们为了一场放荡游戏交换身份时，他骂你道：“啊，拉弗勒，你让我在跑完我的路程之前就卸了套……！”

多纳西安，你已经死去两百年了，而我知道，像此刻的我一样，若有人承诺给你写一封寄往所谓彼世的信，你会为之一笑；我们彼此都确信，这样一封信永远不会送达你在那样一个地址，因为你既然已不在这里，就不在任何地方。你曾经被缺席判处死刑，被以模拟像处决；在艾克斯的布道者广场，一个假人在砧板上被斩首，随后那束稻草被焚烧，你就这样被宣告为民事死亡：对于那个曾经认识你并承认你的社会而言，你不复存在了；你的妻子勒内-佩拉吉应被视为你的寡妇，你的财产可以交给你的继承人，或出售以偿付你的债权人。但这并不妨碍你活着，在别处存在，戴着面具，怀着有朝一日以你的真实身份、在那些你所爱并且也爱着你的人中间重返公民生活的希望，尽管你的越轨行为和你的不敬虔曾给他们带来烦恼。今天，你永远失落了。你坟墓的痕迹已经从“地表之上”消失，正如你在遗嘱中所表达的愿望；你把这份遗嘱写成了令人赞叹的文学篇章，而悖谬的是，它反倒成了又一个理由，使对你的记忆——同样与你的愿望相反——并未从人类记忆中抹去：在这一点上，你的希望被驳倒了。但你对此一无所知，在对一切以及对遗忘本身的主权性抹除之中，因为你已不复存在。

你生前，每当你的诞辰之日回返，人们每年都庆祝你的生日。死后，随着时间流逝，人们忘记日子、年份，按十年、按世纪来计算；既然那个曾被庆祝来到世上的存在已经退出此世，人们也同样——也许甚至更多——庆祝他消失的日期。奇异的庆祝，因为今天活在地上的任何一个存在，都不可能见证两世纪前你消失的那一刻；没有人可能经历过那一刻，也没有人可能记得那一刻。当你的诞辰 200 周年在 1940 年得以被庆祝时，我尚未出生，我既不认识那些记起你并想到你的人，也不知道他们如何这样做。到 250 周年时，在 1990 年——这个日期可被看作一个标志：四分之一千年——我四十六岁，我知道你的作品，我曾关心你的生平、你的命运，我知道你对数字的象征意义和对其隐藏讯息的解读怀有怎样的兴味；然而我并不记得这个周年曾引发纪念活动。

为什么今天给你写信？我究竟是谁，你不可能认识我，而我若不是向你，那么就是向你的幽灵讲话——但幽灵并不存在——并把这份极微小的贡献添加到你在人类记忆中仍然持续存在的东西之上；而这种人类记忆，你预先已经拒绝并否认了，那时你必然只想到你的同时代人，可它却传给了你之后的世代，而这些世代——如果你能够知道，也许会使你大为惊讶——通过你留给我们的东西认识你。“为纪念你”这样来称呼一项行动，是骗人的：你的记忆已经消融在无边的时间之中；你不仅丝毫不记得你在地上的存在，而且你已经忘记自己曾经存在，而这种遗忘本身也不再有任何场所。在“纪

念……”这个表达中，记忆显然是他人的记忆，是那些被传递了你某些痕迹的人们的记忆；这些痕迹有时是宏伟的，而他们在轮到自己失去一切、连自身也丧失之前，还会把它传给那些将在他们之后存活的人，如此继续下去。

因此，你死于 1814 年，享年七十四岁，死在沙朗通，离马恩河与塞纳河迷人的水流交汇之处不远，死在这所旧收容院里；在那里，人们最早声称要治疗疯狂。你终于自由了，并从你一生所遭受的迫害中解脱出来：在你晚年的那个时期，你反而相信你的生活终于开始了，确信自己从此能够投身于你长久以来孕育的几个伟大文学计划，其中有些你认为已经可以送到印刷商那里。这些将来的作品，正是你打算留给后世的——戏剧、历史人物肖像、政治随笔、小说——但那些多半在囚禁中、在各个地牢的黑暗里写成的作品——万森、米奥朗、巴士底……——你曾在其中被囚禁约二十七年，你是否把它们视为应景之作、较不重要的著述？当你那个傲慢而愚蠢的儿子冲进你刚刚死去的房间，为了毁掉并焚烧你笔下所有在他看来可能损害其姓氏声誉的作品时，我们不知道你哪些已经完成或尚在计划中的著作就此遗失，而那个姓氏也是你的姓氏。但我们通过你的信件和日记中的若干页知道，你曾为《索多玛一百二十天》（*Cent vingt journées de Sodome*）在巴士底废墟中的遗失流下“血泪”；这部正在写作中的作品你不得不遗弃在那里，当时，在 1789 年 7 月 4 日起义前夜躁动的巴黎，你半裸而被捆绑着，由差役们用一辆警用马车穿城押送，从你的地牢转送到沙朗通仁爱兄弟会收容院。你曾明确请求你的妻子取回你作为那座可怕监狱最后一名囚居者而留在那里的东西——一座约六百卷的藏书，回应着你好奇心的各个领域；而比一切更珍贵的，是有史以来在恐怖方面构想出的最极端作品的手稿：一卷约十二米长的纸，布满在烛光下写就的微小字迹，并对你的视力造成了最严重的损害——这些恳求都成了无人理会的空文，尽管你已经预感到严重事件、巨大动荡的逼近。你痛恨你的家人竟把你笔下的一部作品留在巴士底拆毁者手中——而这些人正是你曾借助一根用厕所管道临时做成、穿过把你同他们隔开的墙体的传声筒，鼓励并激发其反抗的人——你似乎承认这部作品具有非凡的独特性；事实上，在世界文学中，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与之相比。

正是在确信你已不可能再受苦的情况下，我提出一个假设；它的残酷本会激怒你，尽管人们把你树立为残酷本身的化身，甚至从你的名字造出了一个词，用以指称一种犯罪性的倒错。我的疑问如下：是否必须有最基本需要的被剥夺、最自然欲望的受挫，才会把你的想象带到你自身之外——你并不像人们想看到的那样坏——先是带向对被剥夺之物的再现，你把那东西的梦幻、幻想性的快意提供给自己；随后又带向最坏之物的再现，把它构想为绝对的可憎，以此作为对你的敌人、那些你称为你的掘墓人的复仇性回击？换言之，是否必须有巴士底，这座最臭名昭著的监狱、暴政最可憎的象征，一方面把你的身体贬抑到悲惨处境，另一方面把你的想象引向恐怖领域中可表现者之外？你是否必须以这种残酷的幽禁作为代价，才获得了那些残酷性的灵感与构想，正是这些残酷性使《索多玛一百二十天》如你清楚意识到的那样，成为词语能够拿来向图像挑战的杰作？我们是否应把这份受诅咒的珍宝归功于这场你被强行且不公正地迫入的幽禁，它由语言揭示给意识？这个问题，我怯懦地向你提出，因为我知道你无法回答我；但我想象得出，你那崇高的回答会是何等壮丽，何等充满完全属于言辞与文学的暴力。因此，我如此询问的只是那些能够阅读我的人，我的同时代人，你的同时代人的后裔，他们共同构成了集体意识的一脉谱系。但唯有你能够判断，倘若你有可能在消失两百年后不可思议地回到我们这里，带着如今属于我们的这段距离，判断你是否正是由于一种不可忍受的幽禁，才得以写成一部杰作；而若是在你所向往的自由、幸福、无忧无虑并且略带放纵的生活中，这部杰作本不会来到你的笔下。归根到底，唯有你能够说——而这个账如今已经结清——你是否接受以你凡人存在中的

这个可怕代价，换取这种虚幻的不朽形式。换言之，而且非常粗暴地说：与那些可怕且非凡、推动你写出一部怪物般而令人赞叹的作品的情境相比，你是否本会更愿意选择普通的自由与放荡，尽管它们所产甚少？

我不过是众多读者中的一个，也是那些被这部作品——《索多玛一百二十天》（*Les Cent vingt journées de Sodome*）——吓坏并感到恐怖的人之一。但我也是那些衡量到你的痛苦可能为何等程度的人之一：以至于你并非去经历一种几乎无辜的放荡之快乐——在那个时代，地位比你更高的大领主们过度的放荡曾杀人而不受惩罚——而是以构想最无情地邪恶、挑衅而绝望的虚构，来排遣你在监禁中的孤独和存在。我轻蔑并憎恨你的主人公们，正如我热爱并钦佩他们天才的发明者：这其中没有任何矛盾；在人物中认出作者，是一种过于常见的错误，或者说是公众一种可疑的、顽固而阴险的意愿。

在你的主人公们使其受害者身体的所有器官遭受酷刑之中，性器官似乎处于中心位置，以此表明：任何存在者在自然上都不过是对欢悦的追求，一个人的有机体也没有别的使命，唯有享乐。于是，仿佛是为了惩罚人的身体对于这种享乐的向往，并且从这种向往诞生之处开始惩罚，你把那里变成一种痛苦的场所，这痛苦比最极端的高潮更难以承受、更具毁灭性。对于你的犯罪主人公们来说，死亡毫无意义，因为那时受害者的身体就作为其虐待对象而从他们手中逃逸了。像所有人一样，你也遭受过普通的病痛：例如，你的眼睛曾让你痛苦，你的支气管也是如此。因此，你认识过某些由身体强加的常见疼痛，诚然，是身体强加给它自身的，但尤其是强加给这个身体赋予生命、使之能够行动、爱、思考的那个存在者的。人们归咎于你的那些所谓违法行为：投毒未遂、鞭笞、鸡奸、通奸、乱伦、亵渎……你为此付出了二十七年被剥夺自由的代价。你的名字被用来在所有语言中命名一种倒错，在你之前，人们称之为残酷；而在你这里，它在与性的关系中变得更为明确，仿佛在你之前的世纪里、在所有文明中，一切残酷都不曾与性相连似的；受害者的痛苦使刽子手的享乐变得独特并被凸显，这个刽子手不再需要分享他的快乐，他施予死亡，直到射精。尼禄，早已如此……

这封信毫无意义，因为它寄给你，也就是没有寄给任何人；而在这个虚假的地址之下，将要读它的，是虚假的收信人。因为事实上，今日所有人身上都有你的某种东西，包括那些没有读过你的人，那些不知道你曾是谁的人，以及那些不知道用“施虐主义”这个词来限定自身某些行为的人。这封信唯一真实的收信人，只能是那位极伟大的老者，曼·雷肖像中那个石化的怪物；在二〇一四年，人们本可以给他写道：“先生，我们荣幸地告知您，在经历了一段最不可思议、最离奇的命运之后，您那部著作《索多玛一百二十天》（*Les Cent vingt journées de Sodome*）的手稿，您在一七八九年曾以为它永远遗失了；它最初是在消失于巴士底狱废墟约一百四十年之后于德国重新被发现，并由您作品的友人带回法国；随后又再度遭逢不幸，被一个骗子从其合法所有者诺阿耶家族手中窃走，拿到瑞士出售；而在又经历了新的波折之后，这卷如今已成传奇的纸卷，在今年，在人们曾以为您本人已经消失两个世纪之后，终于回到了您的祖国，从此它将不再离开；它如今被视为一座纪念碑，为法国文学赋予了在世界文学遗产中占据独特位置的特权。”

亲爱的多纳西安，我并不是那个可以给你写这封信的人，而没有任何人是这个人；这也许是你本会喜欢收到的唯一一封信。因此，我刚刚写下的并不是一封信；我在其中向你提出的问题，除了以这种同样的法语写成之外，并无其他合法性；在这法语中，你始终活着，而今日任何作家都只能在你的在场中生活和写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相对于你留下的那个空位而生活和写作。

阿兰·弗莱舍

塞巴斯蒂安·杜宾斯基

– 塞巴斯蒂安·杜宾斯基 –

亲爱的萨德，

我略去那个“de”，如同略去那个“ci-devant”（旧日的、前贵族的称谓）一样，而且我觉得，由我来用您的名来称呼您，会显得太过熟稔。因此，亲爱的萨德，我必须先向您道歉：事实上，我并不分享您的任何一个幻想，而且如果阅读您常常给我带来许多快乐，那么对我来说，那也只是智性的快乐。您作为色情怪物的巨大身影理所当然令人震慑，然而我想对您谈的并不是这个，哪怕有让您失望、并使这封小书信变得十分乏味的风险。不，是另一件事，而且至少和您的猥亵同样重要：您对自由的激进辩护。

我常常想象，您在沙朗通度过的最后岁月，对您来说必定构成怎样的地狱。四年没有羽毛笔、墨水、纸张。四年的空无，监狱中的监狱。四年里，您必定在心中一再重演您生涯中所有最猥亵的图景，在您头颅里那间微小的、深埋的房间内部暗自讥笑；即便在您死后和尸检之后，它也仍将无从找到、不可抵达——非物质的，就像您的自由。

我非常敬重您的勇气和不妥协，敬重您那伪装在虚假放弃之下的求生渴望——那些放弃从来不会持续很久，也从未骗过任何人。因为，挑衅总会回来，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更加夺目。您曾是所有暴政最畏惧的敌人，从路易十六到拿破仑，中间还包括罗伯斯庇尔。您的历程，作为一条与历史并行的幽灵之河，既追随历史，又揭发历史。您的墨水和纸张做成的假人，甚至威胁到了罗伯斯庇尔；而他，可是让真实的头颅滚落，并希望让您失去您自己的头颅。是的，墨水和纸张——而我的赞叹也正落在这里——面对这些如此容易被撕碎或焚毁的纸板剧场，它们将如墙壁一般围绕着最为根本的自由竖立起来：颠覆的自由。

君主制、革命、帝国，都曾在一些作品面前颤抖；这些作品，越过其猥亵与暴力，攻击着一种更大的猥亵与暴力：宗教的、道德的、政治的猥亵与暴力。而自您的时代以来，这一点并没有改变，萨德。恰恰相反。今天，人们也许不会把您关起来，但会找到更糟的办法：人们会无视您，让您在有生之年坠入遗忘，把您囚禁在令人窒息的冷漠之中。人们会用精神药物一剂剂地“治疗”您。

而这对您来说，也许会比您在沙朗通度过的最后那四年更加可憎；在那里，人们禁止您写作。但您至少还可以在内心发笑，因为您知道，您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完成。今天，您很可能不会对此如此确信。

我就是这样想着您，并给您写信，萨德，因为我看见我周围有一些巴士底狱，人们自愿把自己关进去扮演囚徒，而真正的囚徒则看不见身影，在透明的墙后受苦。我问自己，倘若是在此时此地，您会做什么。我倾向于认为是电影。这会很适合您。帕索里尼和其他一些人曾向您致敬。而有了互联网，您就可以分发您的作品，并像您曾经那么出色地做到的那样，一点点散布丑闻。

但作家，不。今天不再是了。我不这样认为。令人悲哀的是看到，文学不再捍卫自由——或者更确切地说，文学不再用来拆毁墙壁。相反，它舒舒服服地局限在墙内，而且有时还玩起自己吓自己的游戏，就像那个看见狼的影像的假牧羊女。

我希望上天已经使您心满意足，并且它并不存在；我希望您安息在您曾如此炽烈地渴望过的那种黑色而绝对的空无之中，也希望您不能看见这个社会——您并不在那空无之中——在这个社会里，挑战甚至已不复存在，除非作为它自身的滑稽模仿。

因此，我向您致意，从自由人向自由人，在象征上，在纸上；并感谢您对我而言始终是那位终极的挑衅者，那位真正的作家。

塞巴斯蒂安·杜宾斯基

现代性

现代性

阿德里安・拉罗什

– 阿德里安・拉罗什 –

朱斯蒂娜-120 致萨德伯爵的四封信

锡米亚讷-拉罗通德，2014 年 7 月 8 日

伯爵：

在我的屏幕映影里，我看见青春期之美本身。浅金色头发，一双蓝色大眼，鹰钩鼻，一张半张着、带笑的漂亮嘴巴。我的腰由于过分纤细而显得虚假。一块胡桃木板。没有臀部，也没有乳房。两颗孤零零的玫瑰花蕾。硬的。一种由瘦削铺陈出来的新型奢华。

我不用羽毛笔写字。我的手指敲击着一个发光的虚拟激光键盘的非物质按键，这个键盘投射在工作桌上（实际上这是一个微型投影仪，显示一个六十三键的 QWERTY 键盘，并通过 Bluetooth 连接到我的 iDevice。它配有可通过 USB 充电的电池，续航差不多三小时。一组传感器负责以 3D 方式确定我手指的位置，并确保输入）。

我读过商学院。如今我在阿普特经营一家全套服务的美容店：脱毛、纹身和穿孔。起初，我在本地区纹身师和穿孔师那里转了不少地方。我在佩利萨讷的 Flesh Industry 学会了门道。我在卡庞特拉的 Myst Ink Tattou 学了基础。我在佩尔蒂的 Tatoo Land 工作了两个冬天，后来又在索尔格河畔利勒的 Tatoo on Move 工作。我在卡瓦永的 Hasta La Muerte 赚了很多钱。我在奥朗日的 L'Encre Peau 加倍努力。最后，我在阿维尼翁的 Seigneur des anneaux 跨过了一个门槛。我把我的店命名为《闺房哲学》，地址是世界尽头街 59 号。我的女雇员们给女顾客脱毛、穿孔、纹身（男性不得进入）。如果我在收银台那里，我就读书。但我很少留在店里。佩拉吉把它管理得很好。我什么也不做就有产出。至于我自己，我隐居在我亡母位于锡米亚讷-拉罗通德的房子里（从这里到拉科斯特直线距离二十公里：村子里开了一所美国大学，*Savannah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更上面，自从您在 1778 年 8 月 26 日被捕以来，那座废弃城堡就成了废墟）。

穿孔是一种身体改造实践，需要用针或导管刺穿皮肤或黏膜，以便在那里长期安放一件饰物。针进入并穿过时，穿孔是疼痛的。这只持续几秒钟。不过有些女孩讲述说，她们像是受到了一阵极为剧烈疼痛的冲击。物件的植入位置最常在鼻子、耳朵和肚脐。但还涉及其他部位。请让我把事情说清楚。小阴唇穿孔容易做，因为皮肤非常薄。这种穿孔愈合很快。两到四周。穿孔之后它可能会稍微流血。小阴唇穿孔不会产生任何刺激，也不会增加感觉。一旦愈合，可以把它撑大，以便穿过更大的饰物。由于皮肤有弹性，只放环，因为直杆和马蹄环上的珠子固定不住穿孔饰物。可以只穿一侧小阴唇，也可以两侧都穿。并且可以穿好几次。唯一的限制是小阴唇的大小。我的一些女顾客在那里戴到六个。甚至更多。另一些则更愿意作用于大阴唇。后者的组织比前者更厚。愈合时间更长（在三到六个月之间）。大阴唇穿孔比小阴唇穿孔疼得多。一般放一个环，必须小心别让它挂到内衣上。我还要对您谈谈 *Christina*，它在阴阜表面；*Capuchon*，顾名思义，是横穿阴蒂包皮安放的。这种穿孔可以根据女孩

的解剖结构做成垂直（直杆）或水平（环）。*Fourchette* 安放在阴道口后连合处，*Guiche* 放在会阴上，*Isabella* 是从阴蒂下方经过、甚至根据形态横穿而过的穿孔，*Princesse Albertina* 穿过尿道管，*Triangle* 位于阴蒂和尿道之间，也就是小阴唇接合阴蒂包皮的地方，而 *Néfertiti* 则是一个垂直 *Capuchon* 和一个 *Christina* 的组合。一般来说，生殖器穿孔在穿刺时非常疼。一旦下定决心，疼痛就算不了什么（这是我在店铺线上广告里使用的销售说辞）。而且，一种油膏，一种仔细涂抹在被撕裂女人身上的香膏，可以减轻受伤者的痛苦，即使不能抹去伤口的一切痕迹。

不过关于这个话题就说够了。

您看，青年近乎军事化的从众主义，如今让它迎合色情制品的规范：任何前青春期少女或年轻女人都必须展示一个没有阴毛的阴阜（这并不能预判她是否愿意参与廉价的自我性高潮）。于是穿孔就看得更清楚。我的生意兴隆。无疑还有更好的事可做……

我想同您谈得更久些，但时间催促我。下一次我会对您说更多。我十分温柔地亲吻您。

朱斯蒂娜

附言：Justine-120 是我在网上使用的化名；但我同您的私人通信则署名为朱斯蒂娜。

锡米亚讷-拉罗通德，2014 年 7 月 11 日

伯爵：

今晚有雷雨。远处的闪电忽然照亮我给您写信的卧室窗前。情势如何？如今，距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相隔甚远，早已不再只是出售活物的问题。任何被再现的身体，任何形象，任何面孔，事实上任何图像和任何形态，现在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奥斯维辛那些毁坏了的身体贯穿。仿佛毒气室——六百万犹太男人、女人和儿童在那里丧生（先生，请注意这份阴森的账目）——产生了一种化石般的振动，在每一个男人、女人或儿童的身体背后回响。数百万具身体真实地被生产为物品，而对这数百万具身体的遗忘同样也真实地被生产为物品。在毒气室里，身体和记忆被猛然投入了工业时代。匿名与不分明。然而，灾难之后，战后关于尊重人体的共识很快便出现裂缝。关于人体尊严的话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犯下的暴行之后发展起来，又很快被抛弃。出现了一道裂痕，一种脱节，一种分裂。战争期间发现的技术很快又被重新用于幸存者身上：超声检查（通过超声波看见母亲腹中的胎儿）源于防御空中轰炸的技术。从战后开始，人体组织不再完整地从一个人（供体）转移到另一个人（受体）那里，而是根据不同过程被改造：分割、克隆和增殖。血液本身被分离成许多成分：血浆、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它很少再原样输注。于是，一个人的血可以流向不止一个人，而一个人也可以接受多个人的血。血让我感兴趣（否则我就不会在这里谈它，也不会做纹身和穿孔的生意）。换句话说，这种把祖辈经验资本化到后代生命之中的做法，以及由此而来的疲惫、脆弱，把后代往下拽。或者说：如何继承？

先生，这就是折磨我的那些想法。现在，被肢解并同人分离开的身体部件在世界上流通。它们是新的恋物。活物的碎片被贫穷国家卖给富裕国家。人体拍卖。赠予的实践转变为掠夺。身体及其器官，内部的身体，身体制造厂的组成要素，不再逃脱商业、广告、游戏和景观。恰恰相反。物品比活物更受偏爱。心脏在盆里泡着，肾脏呼吸的锅盆里升起蒸汽。人体器官、细胞和组织的移植，是非法交易和消费的首要对象（在毒品和女人之前）。输血和医学辅助生殖不再考虑人体的不可处分性和非财产性——未经我同意，不能触碰我的身体；人体不能成为财产的对象，既不能成为他人的，也不能成为自己的。身体不能成为暴力的对象。它不应该如此。

雷雨靠近了。我继续。先生，理性组织世界，是为了把一切人类对象制成奴役的材料。身体是在操控和管理的层面上被把握的。所有人，甚至此处还不谈动物，都变成可重复、可替换、可互换的过程。科学同自然和人类的关系，与保险科学同生与死的关系并无不同。金融资本主义的驱力组织偏爱短期和即时满足。于是它同样摧毁个人投入和责任意识。爱被化为乌有。规划，您昔日曾为它树立一座纪念碑，如今正在全球化。我们从何得知启蒙推动犯罪？从何得知，曾使人文主义成为可能的人的梦想，就是走向怪物？

我发现已经是凌晨三点，而我原本只打算写一个词，却写出了一卷书。回头见，先生。

朱斯蒂娜



锡米亚讷-拉罗通德，2014 年 7 月 13 日

伯爵：

我又见到了朱丽叶。她向您问好。她好极了……我曾对您说，还有更好的事可做。您知道吗，即使远到普罗旺斯，出租子宫也已经司空见惯（据估计，这个市场每年达三十亿美元）？朱丽叶自愿加入。她签了一份代孕母亲合同。报酬丰厚。昨天，在洛兹·德·佩雷林荫道，在灿烂的阳光下，在被雷雨洗净的纯净天空下，一边喝着饮料，我喝柠檬水，她喝茴香薄荷酒，我们的朋友向我谈起医学辅助生殖越来越精密的各种技术，以及人类繁殖的新技术。

器官移植如今已经普遍化了，我在上一封信里对您说过：眼睛、角膜、心脏、心瓣膜、肝脏、胰腺、肠、股静脉、骨、肌腱。皮肤。但这样说等于什么也没说。在献血之外，又增加了精子、卵子，甚至胚胎的捐赠——具名的或匿名的。马赛开了一家精子库。在这个实验室里，精液先在生理液中稀释，再被分成小剂量并冷却或冷冻。配子被保存在 -196° 的氮罐中。每一剂被称为一根细管。那些可能不具备受精能力的批次会被撤除。会进行各项检测。于是，一个男人的精液可以被储存多年，并轻易运送到任何地方……精子的发现，生物学家神父斯帕兰扎尼（Spallanzani）的进展，那个屏风——由医生把十八世纪的男人藏在屏风后；在前来援助那个丈夫不育的女人之前，他就躲在那里，以便把自己的新鲜精液注入她体内——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冷冻保存使捐赠的时刻与使用的时刻得以分离。保存在氮罐中的细管，使捐赠者与接受者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分离开来……

正是这种精液被用于人工授精技术。它是在排卵时，把经过或多或少处理的精液注入体内。但*体外*受精是另一回事。不如听听朱丽叶的例子。卡庞特拉（Carpentras）的一对女同性恋伴侣，其中较年轻的那位女性没有子宫，她们想要一个孩子（为了她个人的利益，并以平等之名，我还会回到这一点）。这对伴侣需要一位代孕母亲，而不是卵母细胞。朱丽叶自愿承担，正如我在这封信开头对您说的那样。于是，在卵巢刺激之后，继而对卵巢中卵泡的发育进行监测（超声、验血）之后，在卵母细胞自然释放前数小时，通过超声引导下经阴道穿刺，从这个重组伴侣的卵泡中取出了卵母细胞。这样取得的卵母细胞随后与经过处理的精子置于一起。最后，这些受精卵母细胞被培养了六天，以便评估其形态。在按照常规由卡庞特拉这对伴侣的配子完成*体外*受精之后，移植在朱丽叶的子宫中进行；孩子出生时，她会把孩子交还给遗传学母亲。不是交给他的父亲。没有父亲。朱丽叶享乐于这个念头。

朱丽叶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他人支配。她没有提供遗传贡献，也就是说，没有提供卵子，而是承担了胚胎在*子宫内*的发育。她圆鼓鼓的。她怀着这对伴侣的孩子。她是在这个词的具体意义上怀着他。她怀着不可承受之物。作为一位优秀的哲学家，她这样做时，依旧冷静而审慎。一切都在没有幻觉的情况下发生。她在蓝天之下对我说，这种导致母亲被否定的对女性的工具化，使她感兴趣。更让我们这位朋友享乐的是，在把孩子怀在自己的肉身中之后，她必须把孩子留下，并以这种方式——冷冷地，独自一人——操练自己的心。朱丽叶很快就会摆脱了。我希望过不了几天，就能向您宣布这个新类型的小孤儿的到来！

我对您说过，以平等之名，同性伴侣已经获得了结婚的权利，如今又要求拥有孩子的权利。同性恋反文化的失败已经证实无疑，男同性恋向资产阶级从众主义的投降，也是绝对的。同性恋事业本身也轮到它被新自由主义理想所赢得。同一性别的伴侣归入队列，拒绝同性恋自身固有的限制，即不可能拥有孩子。与生物技术结盟的平等主义导致无差别化。新女性主义者们于是想要超越性别的不平等。这个无聊、虚假、满足已尽的社会，还想要平等，好极了。法国女人们，如果你们想成为共和主义者，就再努力一下吧！

再会，先生。

朱斯蒂娜

附言：科学正在致力于研制人工子宫。如何在*体外*确保通常由胎盘和子宫承担的全部生理功能？据说，问题在于通过提供一种在母体之外完成妊娠末期的方式，来预防极早产的后果。人工子宫构成了性与生殖分离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说真的，是最后一个阶段。除非去想象人类生殖性克隆能够成为现实。从这台机器中诞生的孩子会有生殖器官，却没有肚脐。他们将只是当下的简单造物，并且是投向未来的投影，与过去没有任何有意义的联系。人工子宫是通向创造彻底后人类身体的道路，是为了人类园而迈出的决定性进展。体外发生是正在到来的东西——冷漠是正在到来的东西。我在我的床上奔跑。

西米亚讷-拉罗通德，2014 年 7 月 14 日

伯爵：

就在我刚才正要给您写信时，我听见窗下有马蹄声。我把头探到外面。几匹马正沿着陡斜的街道往下走。已经没有人骑马出行了；这些无疑是迷路的*新时代*骑游者。看到这些优雅的坐骑，使您曾经经过这片土地的记忆从过去重新浮现。马匹沿街又往上走。那里有一匹漂亮的母马，由一名骑手牵着；骑手身穿灰色长礼服，身侧佩一把猎刀，手里拿一根手杖。那动物在铺路石上绊了一下。您弯下身去帮助它。就在您直起身来的时候，您看见了我。突然之间，您活着。

当我的女顾客们同意让人取走组织、一个器官，或者同意在身体可见部位纹上一则广告时，能否说这是劳动、服务？这并不显然。难道朱丽叶被禁止设想，对于把自己的身体交付使用，获得报酬是正当的吗？长期以来，只有女性拥有决定要不要孩子的权力。今天，女性也在自身之外生育。新技术带来的后果，是造成一种从前不可思议的母性分离：昔日不可分割的生理母性，已经能够分成遗传母性与妊娠母性。*Mater semper certa est.* 母亲永远是确定的。如今母性是不确定的。像父性一样，母亲成了一种法律虚构。生育与亲子关系相互区别，尽管彼此依赖。不再有生物学父母。脱婚化成为规则。亲子关系破碎了。它死了。虚构赢得了这一局，游戏也赢得了。

既然子宫不再需要被将要出生的孩子撕裂，也不再需要被任何东西撕裂，那么它现在完全可以充当珠宝匣！

伯爵——主体裂开了。今天，谁还能充分地承担自己的男人之名？二十世纪，在男人与其名字之间产生了一种极薄的差异，它至今仍在持续。男人专名中的一道切口。在其他新事物之中，人类生殖的新技术，以一种庄严的讽刺，证明了这道切口、这种差异、这个破碎之人的裂缝。

男人是裂开的。我这个年轻女人笑了——今天，只要她愿意，女人不再 *s'esclave*（把自己变成奴隶/奴役自己）了。[注]

> [注] 原文斜体 s'esclave 在词形上含 esclave（奴隶），以反身动词的形式写出"不再自我奴役"的意思；中文保留这个词形及其语气。

再会，再会，伯爵。

朱斯蒂娜

卡特琳·居塞

– 卡特琳·居塞 –

纽约，2014 年 2 月 23 日，星期日

我亲爱的萨德，

你无法想象，那份邀请我参加你逝世二百周年纪念的请柬给了我多大的快乐。不仅人们仍在庆祝你，而且你还想到把我的名字写进那份经过筛选的宾客名单：你还记得我，这个这么久以来都没有给你任何音信的人！你给予我的这份荣誉让我感动。我当然会到场。你的庆典，我无论如何都不会错过。我已经预想到，届时我会怀着怎样的激动拥抱你——同时小心不要把你抱得太紧，因为你现在已经很老了！我们三十六年前相遇；我最后一次见你，是大约二十年前。但青春时代的友谊是不可摧毁的。你对我永远亲近熟悉，即便生活把我带到离你很远的地方，即便我们当初分手时并不是在最好的情形下。

你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吗？你答应了我的邀请，坐船横渡大西洋，到我的海岸来找我。我在纽黑文接待了你。我多么高兴能再次见到你！但从最初几刻起，我们之间就有了一种不适。我带你去了一家酒馆，你点了一杯啤酒，不久你一个笨拙的动作就把它洒在了我的膝上。我的膝头湿透了，而你在笑。你的笑里没有任何友好的东西。我们从酒馆出来，你停下来凝视市中心，那里被称作“*The Green*”，是一大片绿色草坪，上面立着两座教堂。我立刻猜到了你脑子里闪过的念头。我绝不可能让自己暴露在丑闻之中。我是这座城市里的教师，我住在那里。我赶紧把你带走，不让你有时间把你的提议说出口。你用一种近乎轻蔑的审慎目光看着我。你认不出我了。你不理解我已经变成的那个人：备课，晚上给丈夫做饭，早早上床，星期天邀请公婆来家里。我至今还听见你那声插话，伴随着一阵冷笑，让我一直红到耳根：“你的公婆！”这个词，你不是说出来的：你是吐出来的。它包含了一个对我不可逆转的判断。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可对彼此说的了。你走了。多年来我一直想着你，尤其是在夜里，在梦中，或是在清晨猛然惊醒时。我给你写过一些信，但没有寄出。你和别人一起过着你那疯狂的生活。你依旧自由。对你来说，我并不自由。你不接受任何妥协。你把我抹去了。我终于把你忘了。我只有一个念头：要一个孩子。几乎令人无法相信，我和你曾经有过某种关系。

然而。我遇见你时十四岁。我又看见那只固定在墙上的木头和金属小书架，上面摆着我父亲的书。顺便私下说一句，我父亲是很迷恋那件事的。这让你觉得有趣。后来你鼓励我打开婚床旁边的柜子，里面有色情杂志和一个振动器。是什么把我吸引到你那里去的？你甚至连图像都没有。我一定是在某些令我好奇的场合听人说起过你的名字。有一天，我把你从书架上抽出来，只抽出你一本，你那小小的、不显眼的书脊迷失在其他书之间。我随手翻开了你。鞭子一抽。雷霆一击。一个女孩正在被四个修士强奸。遭受暴力的不只是她的身体，还有她的灵魂：因为那些修士想向她证明，尽管她装得像个假正经，尽管她为他们让她承受的暴力感到惊骇，尽管她并非自愿参与其中，这并不妨碍她体验到快乐。她湿了，她享乐了。修士们赢了。

被迫享乐：你给了我最钟爱的幻想以形式。许多年里，只要我把你翻到那一页，读你那几行字，就足以让我享乐。文字的力量远比我父亲柜子里的图像更强。你卖弄风情地垂下长长的睫毛，看着我："告诉我，在她们和我之间，谁更美？"你知道答案。那些色情杂志没有一本拥有你的劲健、你的力量、你的能量。我没有看错。我又回到你身边。我对你忠贞不渝。我像朱斯蒂娜被修士们捆住那样，用丝巾把自己绑起来。然后我重读你的句子。

六年里你没有离开我。我二十岁时，发现自己坐在一位索邦老教授的办公室里，人们指定他做我的硕士论文导师。我必须决定一个论文题目。坐在我身旁的你，在我耳边低语："Prends-moi……选我，要我……Prends-moi……选我，要我……"[注] 语调淫秽，让我脸红。我害怕那位近视又半聋的教授最后会听见你。同时你又让我发笑。我不想离开你。和你在一起，我确信自己不会无聊。你是唯一一个我能与之度过整整一年的人。我会不停地质问你，好从你那里得到一个困扰我的问题的答案：印在纸上的简单文字，怎么会有使人达到高潮的力量？我说出了你的名字："萨德。我想研究萨德，研究《朱斯蒂娜或美德的不幸》（*Justine ou les malheurs de la vertu*）。"老教授抬起一只惊讶的眼睛看我。面对一个清新、金发、神情羞怯的高师女生，他期待的是一个稍微更严肃的选择。他在眼镜后眯起眼睛，做了个怪相。"萨德，那是七十年代的东西。你研究朱利安·奥弗雷·德·拉·梅特里吧。——研究谁？——朱利安·奥弗雷·德·拉·梅特里，十八世纪的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你可以在索邦图书馆找到他的作品。他仍然很少为人所知。"我没敢抗议，尽管你抬眼望天，受了冒犯，并且轻蔑地叫道，而我并不知道你说的是教授还是拉·梅特里："这个小丑！"我花了一年时间感到无聊。我唯一的消遣，就是在上午快结束的时候打开你，让你慢慢进入我。但随后又必须把你合上，去读那位唯物主义哲学家的作品。我向自己发誓，再也不会让人这么摆布我。

> [注] "Prends-moi"字面为"拿我/取我/要我"，在论文选题语境中是"选我"，同时保留了萨德式的性挑逗意味。

你依然让我着迷。如果必须研究一位作者，我想那就该是你。要成功抓住你，攥住你。两年后，刚通过教师资格会考，我就溜出了索邦，迁往更自由的海岸。朱西厄。在那里，没有人会阻止我选择你。我想研究朱斯蒂娜；让我感兴趣的是她，那个受害者。我认同的是她。在朱西厄，我遇见了你的另一位使徒——我听见你笑了："别夸张，我可不是上帝！"——她像我金发一样黑发，像我希望保持纤瘦一样丰腴。她胖而美。她不为自己的身体羞耻。她爱它。她当然想研究朱丽叶。

一天晚上，朱丽叶和我去一家中餐馆吃晚饭，她跟我谈起菲利普·索莱尔斯。她是加拿大人，来到巴黎研究你，目的就是为了见到索莱尔斯，你的追随者。她做到了。她告诉我，她和他上床，而他鞭打她，让她写作。他在自己的杂志《无限》（*L'Infini*）上发表了她的一篇故事，里面她描述了自己如何在西班牙被斗牛士们鸡奸。

我们走出餐馆时，我心情沉重。她才是真正的萨德信徒，配得上你，凯旋的朱丽叶。我注定只能继续做那个受害者，小朱斯蒂娜，披裹着我的美德衣装，高师，教师资格会考，等等。你暗自发笑。我的哭哭啼啼，我的焦虑，给了你一种奇异的快乐。真相是，你爱我并不亚于爱你那肉感的朱丽叶。你有各种趣味。况且，作为一个羞怯的人，我并不缺少胆量。像朱斯蒂娜一样，我假装自己是被迫的，但我有性情。你是希望我好的。你给我出了一个主意：在朱西厄一位美丽的黑发女教授的课上做一次关于你的报告，她带着外国口音，而恰好是你在世的最伟大追随者的妻子。这是个奇怪的主意。在一门关于忧郁的课上做关于你的报告？你完全不是忧郁的！你耸了耸肩。"你自己想办法。你求学时学到

的，不就是这个吗？只要能把它说圆，什么都能讲。重读我。我确信你会找到点什么。”我重读了你，是的，我找到了线索。朱斯蒂娜在哭。我做了一次关于朱斯蒂娜的眼泪以及你的作品中忧郁之缺席的报告。我大量引用了你。美丽的黑发女教授称赞了我。下课后我去找她：“我想根据这份作业写一篇文章。您会不会有什么主意……？——以我的名义把它寄给菲利普·索莱尔斯吧。”她立刻用她迷人的口音回答，并没有说明索莱尔斯是她的丈夫。“瞧吧！”我一走出教室，你就得意扬扬地叫道，“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所以，正是多亏了你，我才遇见了索莱尔斯；这次相遇改变了我生命的轨迹，因为他后来会鼓励我写小说，并在几年后出版我的第一部小说。我把我的文章寄给了他。一周后，他给我打了电话。是他本人，亲自打来的。我的手心冒着汗，把听筒贴在耳边，里面回响着他的声音。他约我在一家酒吧见面。我见到他时激动得厉害。他会把我绑起来，鞭打我，好让我写作吗？他会同我实践那些从你的想象中诞生的姿势吗？他额前的头发剪得齐齐的，又有一张娃娃脸，看上去完全像个修士。我已经准备好投降，但他没有要我。他把我遗弃给了我那有德行的受害者命运——这让你松了一口气，因为我相信你本来会嫉妒。面对我的懊丧，面对我害怕自己没有讨他喜欢、对他来说不够美、不够性感、不够女人，你温柔地对我说：“不，不是那样！别再以为一切都和你有关了！索莱尔斯和我一样：他更喜欢把这些事情写出来，而不是去做。”索莱尔斯没有要我，却收下了我的文章。文章发表时我人在美国，那是我第一篇发表的文字。我急忙冲到图书馆去找那期杂志。我受到了震动。封面上，在参加该期杂志的作者名单里，写着：“Catherine Lusset”。我的第一次发表，甚至不是以我的名字。你窃笑起来。“别抱怨了。你难道更喜欢‘茅厕·居塞（Latrine Cusset）’吗？”从那一刻起，这就是你给我的小名：Latrine，茅厕。你很喜欢它加诸于我的羞辱，喜欢那股令人不快的厕所气味像光环一样围绕着我。

与此同时，我自己也开始研究朱丽叶。我选了一个博士论文题目：“萨德《朱丽叶的故事》（*Histoire de Juliette*）中的理性与虚构”。我想明白，为什么你写的是小说，人们却把你当成哲学家来对待。可是你写的真是小说吗？里面有人物、故事、肉体吗？还是只有论题？你是一个好作家吗？我花了五年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半途之中，我失去了你。我不再知道该怎样看待你。我十四岁时的那份新鲜感是多么遥远啊，那时我打开《朱斯蒂娜》（*Justine*），遭受了一次辐射全身的震动！你不再使我触电。我在写博士论文，铺展开一些乏味的句子，换来我的导师的认可；我读拉康、德勒兹、克洛索夫斯基、巴特、索莱尔斯以及其他人写你的文字；我把你埋葬在他们的话语之下。

当别人得知我在写一篇关于你的博士论文时，有时会有一只撩拨而色欲熏心的眼睛抬起来。我对此厌恶至极。我把自己裹进我的德行里。

人们问我这个专家，你是不是一个好作家。我承认，我也像所有人一样，读你读不下去。可是你有风格。一种锋利、鲜活、锐利、像钻石一样切割的风格。对此我确信无疑。我曾看过一些受你生平故事启发的戏剧，它们让我无动于衷，除非某个句子突然闪耀起来，以其纯粹、力量和冷峻的幽默攫住注意力：我立刻就知道，那是你的一句话。

我博士论文答辩那天，尊贵的评审团成员们想知道，我对你所做的这项工作，和我刚刚出版的第一部小说之间是否有联系。“毫无关系。”我用紧绷的声音回答，仿佛有人指控我在肮脏的厕所里同你上床。你的名字，在某种程度上，使我隐隐作呕。我写的是一部爱情小说。我相信激情。

我是在清教徒式的美国与你脱离的。作为耶鲁的教授，我讲授放荡小说，讲狄德罗、普雷沃、小克雷比永、维旺·德农，而不是你。怎么讲授你？怎么把你的句子读给女学生们听？

那么，为什么给你写信？我有什么话可对你说，能让你高兴？你肯定并不在乎我怎么想。可还是请允许我向你表达我的钦佩。是的，我钦佩你。我钦佩你的坚持，你那执念的力量，你的自由。我钦佩你在监狱中创作出一部作品，它击碎了监狱的墙壁，也打破了时间的隔板。你身上有某种奇妙地健康的东西，你这个纵欲的先知。有一种侵犯全世界政治正确的方式，给它塞上堵嘴布，阻止它说话，并使它享乐。归根结底，在这个属于我们的世界里，这个比你生活过的世界远为不自由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比你对虚伪的厌恶更纯粹，没有什么比你的疯狂更合理。

致你，我的多纳西安，

卡特琳（Catherine）

安东尼·卡萨斯·罗斯

– 安东尼·卡萨斯·罗斯 –

巴塞罗那，花月三日

亲爱的多纳西安-阿尔丰斯-弗朗索瓦，

我刚刚同你和“朱莉”——你的妻妹安娜-普罗斯佩尔·德·洛奈——一起在意大利旅行，并在你的文学笔记中发现了你所引用的这句话，它把我带上那些道路，坐进由三匹马牵引的两轮马车，带进那些客栈和风景之中，在那里你逃避着司法的狂热：“自然中有一种相互的倾向，它邀请物质的一切分子彼此靠近并结合。”而你又补充道：“正因为人的精神是有限的，他才不能理解物质的永恒，而正是他精神的这一缺陷，使他发明了诸神。”而在你写给这个幽灵之神的信中：“虚妄而空洞的存在，仅仅你的名字，就使地球表面流下的血比任何政治战争将来所能倾流的都更多，愿你重新回到那虚无之中，正是人的疯狂希望和可笑恐惧不幸地胆敢把你从那里拉了出来。”

我自己，这个看不见的幽灵，你们疯狂夜晚的见证者，你同那位体现了女性之闪电般光芒的女子之间激情的见证者，我越过山口，走下葱绿的谷地，逃过潜伏在客栈里的强盗，忍受那些险路上的颠簸；而当你享用你的妻妹时，我记下了一些笔记。首先是她的肖像：“她心智与心灵的魅力丝毫不让于她容貌的魅力；而如果那些见到她的人学会了爱她，那些认识她的人便确实不得不崇拜她。她很早就习惯于让自己的理性说话，并以哲学的方式抖落教育和童年时期的一切偏见，在别人几乎还只勉强知道如何思考的年纪，她已学会认识和判断。她灵魂的一切能力都获得了新的强度。”于是，远离你的普罗旺斯和你的拉科斯特城堡，远离巴黎，远离莱利在一首诗中漂亮地提到的那些指控：

一千七百七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六，

多纳西安-阿尔丰斯-弗朗索瓦·德·萨德在马赛，

心为他那有着疯花之眼的美丽妻妹所俘，

在可爱的清晨鸡奸四名二十岁的姑娘

（我看见她们的乳房）

奥巴涅街十五号之二，十点钟，如同今日……

我们三人便穿过群丘疾行，发现都灵、帕尔马、罗马、那不勒斯，发现绘画的奇观，以及你对玛格达莱娜的迷恋；在各种唤起之中，她似乎凭借自己女罪人的光环逃脱了你对教会的仇恨。

教堂我们参观了许多，以我的口味来说太多了，但你无疑是想让你的情妇的心向其中所见的绘画与雕塑之美敞开。年轻的女参事会修女拥有足以使你发热的一切：童贞、宗教，以及一种纵肆狂暴的激情。十六岁时，她给你写下了这份激情的誓言：

> *我向萨德侯爵先生，我的情人，发誓：我永远只属于他，永不结婚，永不把自己给予他人，忠实地依附于他，只要我用来封缄此誓的鲜血还在我的血管中流动。我把我的生命、我的爱情和我的感情献祭给他，其热烈正如我曾把我的童贞献祭给他一样。我向他发誓跟随他去威尼斯，他想带我去那里，并在那里永远同他生活，如同他的妻子。*

在这次奇妙的旅行中，我记下了若干令人着迷的元素：你对阉伶、对他们的呃逆声以及对那不勒斯放荡的厌恶，在那里，六岁的女孩被她们的母亲献给旅行者；鞭笞者们在一个组织良好的会众中自我鞭打；圣阿涅丝的殉难，这位年轻处女被送进妓院，在那里遭受强奸，又奇迹般地被一位击倒侵犯者的天使所救，这个故事使你难以置信：“在我看来，所有这一美丽寓言只要十分简单地承认这一点，就会解释得好得多：那个年轻男子刚刚同这位年轻圣女品尝完快乐，她几乎才刚脱离童年，容貌又最为动人；他从她怀中出来时，因虚弱而昏厥，并在几个小时的痛苦之后恢复了生命。”

1776 年狂欢节的丰饶乐园：饥饿的人民扑向一座由国王下令布置的祭坛，在那里，鹅、母鸡、火鸡被活活钉上十字架，等待众人抢掠；周围还有牛肉块、羊肉块、面包、鳕干和糖果；这座活金字塔由掷弹兵看守，直到次日正午，那时乌合之众，四五千人，终于有权冲向食物，并为了带走一块牛腿而彼此残杀。

遇见一个展示自己两种性器的雌雄同体者，以及看见那座著名的大理石普里阿普斯，虔诚女信徒们曾在其上情欲荡漾地让自己被贯穿。还有一件德行家具，用来绑住已婚女人并迫使她们忠贞。在各个驿站，你品尝蒙特普尔恰诺葡萄酒，但正是在参观拉特朗圣若望大殿时，你给了我这封信的关键元素：你谈到主祭坛，那里保存着使徒彼得和保罗的头颅，“置于饰有宝石和一朵金百合花的银瓮之中，金百合象征它们由一位法国国王捐赠，我想那是弗朗索瓦一世”。

从使徒们的头骨，让我们转到你的头骨。1781 年 5 月 13 日，安娜-普罗斯佩尔·德·洛奈在三天濒死挣扎之后突然死去，死于腹膜炎或天花，年仅二十五岁，并履行了她的誓言。在经由国王密札下令的二十七年监禁之后，你逝去，肥胖，执迷于老鼠，执迷于你的怪癖，而你把这些怪癖同香草联系在一起；你的屁股被鸡奸套筒磨损，而你小心翼翼地向妻子说明其直径（九厘米），那是一个漂亮阳具的尺寸；你还为缺少空气、散步、内衣，尤其是缺少用来写作的本子而焦虑。你无疑还执迷于那份十二米长卷轴形手稿，在其中你写下了你最美的狂想，即那些《索多玛一百二十天》，你不得不把它遗弃在巴士底狱，它曾被小心地藏在一块石头后面，而你以为它已经失落。你被一部完全写于囚牢之中的作品弄得疲惫不堪，而它有时又被你的看守烧毁或没收。

在沙朗通，人们把你埋葬在疯人院的墓地里，举行了宗教仪式，却忘记了你的最后意愿；你本想安息在你位于博斯地区马尔迈松的土地上，不举行任何种类的仪式：“墓穴一经重新覆盖，其上将播撒橡子。”

你的儿子将让警察烧毁《弗洛贝勒的日子》的手稿。他会恳切请求人们不要在文学史中提到你，并且几乎成功了，直到二十世纪初。

三年后，借沙朗通墓地重新整修之机，你的坟墓被打开，人们发现你还穿着衣服，骨头洁白，而那位极其钦佩你的好医生拉蒙请求把你的头骨交给他，且对“这件圣遗物的真实性”毫无疑问。带着不无讽刺的意味，你加入了彼得和保罗；但斯普茨海姆出现了，这位著名的颅相学家兼拉蒙的朋友，让人把你的头骨交给他，以便研究。斯普茨海姆带着你去了德国、英国和纽约，并在没有归还你的情况下死去。

正是在那时，你的头骨令人幻觉般的流转及其至少可称奇异的显现开始了。所有人都一致把它描述为极其明亮，并散发出一种骇人的能量。斯普茨海姆的助手拉普雅德同他那位永不餍足的情妇有一些勃起问题，于是决定把左上颌的一部分磨成粉末并吞服。几个小时之后，这个原本只限于教会所认可关系的男人，鞭打并鸡奸了他的情妇，随后被判处苦役，并死于疯狂之中。

1872 年，头骨重新出现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一处市场上；在那里，在众多见证人面前，头骨说话了，并呼唤一个名叫玛德莱娜的妓女，随后猛地跳动。商人想抓住它。他的手被严重灼伤。于是头骨叫嚷道：“基督去死。我拉屎在圣家族身上。”

1920 年，头骨重新出现在马赛一所收容年轻不顺从女子的院舍里，在那里，怀孕的女孩们被关在一间阴暗的房间中。你头骨的强烈在场引发这些女罪人的自发流产。大主教和监狱管理部门赞同这种不太正统的方法。

1973 年，头骨重新出现在施泰因医生位于屈斯纳赫特的宅邸中，这座旧宅里，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曾任由他对萨宾娜·施皮尔莱因及其他女病人的激情泛滥；但在对一名裸身女病人进行首次检查时，医生和这名年轻女子失去知觉。人们诊断为头骨的邪恶效应，可能导致疯狂或死亡。

医生的园丁本该把头骨碾成灰尘并扔进湖里，却急忙偷走了它，并前往里昂，把它转卖给一位爱好者。路上，他的小货车撞上一辆罗姆人的篷车，他葬身火海。罗姆人夺走了烧黑的头骨。

1986 年，蒂博·德·萨德伯爵在巴黎人类博物馆找回了头骨，它的一件翻模被赠给一位狂热的历史学家。在那里，这件翻模开始发出猛烈的放电[注1]。

> [注1] 参见雅克·谢塞克斯极美的最后一部小说：《萨德先生的最后头骨》（*Le Dernier Crâne de M. de Sade*），巴黎，格拉塞出版社，2009 年。

2014 年，头骨放在一个胡桃木底座上，置于一位作家的书桌上；他的名字我将隐去。它似乎不再发出负面辐射，但它如此明亮，以至于夜里，满月的清辉充满整个房间。

我想给你讲述这个故事，告诉你我热烈的钦佩。如果你有什么要回答，不要害怕开口。望向你眼眶的最深处时，我觉得你已经找到了平静。有时，当我在黎明前起身，你美丽的蓝色目光漂浮在你头骨的黑曜石之中。

向这头骨、向你的沉默和你的自由致敬！

安东尼·卡萨斯·罗斯

娜塔莉·埃尼克

– 娜塔莉·埃尼克 –

巴黎，2014年4月15日

亲爱的侯爵：

请允许我只用您的贵族头衔来称呼您：我的同时代人甚至不需要您的名字也能明白，“侯爵”只能指向您，同样还有“多纳西安”这个迷人的名字。况且，如果您回到我们中间，这种知名度无疑不会不令您惊讶，而且大概也会令您欣喜：谁会不喜欢仅凭一个简单的转喻就能被识别出来呢？

尤其是，谁会不喜欢自己已经成为一个象征呢？

但究竟是什么的象征？这就是一个问题：如果您在这里，看到人们把您变成了一个形容词，甚至是两个形容词——心理学中的“施虐的”，文学中的“萨德式的”——您自己大概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把文学留给文学人士，我将集中谈心理学，至少是在它触及我的学科社会学的限度内——您必定不知道这门学科，因为它在您的时代还不存在。而我将以一种有点傻、但很讨我的同时代人喜欢的形式提出这个问题——您成了什么的象征：“萨德是什么之名？”

对于这个问题，存在两个回答。第一个回答与您同时代，而且在我看来，它与您写作时所持有的价值相合：也就是说，当涉及反对社会习俗的虚伪和对欲望的压抑时，强者有权对弱者行使自己的权力；或者至少，当无法真正行使这一权利时，有权表达这种权利的幻想。有人会抗议说，这是不道德的？不，您会反驳说：这符合贵族道德，它赋予少数人逃脱共同法律的恩典。几代人之后，一位后来同样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将把这一点形式化；他虽然没有像您那样终结于疯人院，却也依然死于疯狂。

第二个回答出现得更晚，因为它只是在您写出那些著名作品大约两个世纪之后，也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才在共同文化中——至少在我们国家——确立起来。那么，萨德之名已经成为并仍然是什么之名呢？好吧，是反对社会习俗的虚伪和对欲望的压抑的权利，是性能够颠覆一个被视为异化的社会的能力，也是应当赋予文学在表达人类情感时的全能。也就是说，一组三位一体的价值——艺术、性、个体面对“社会”谎言时的真实性——它作为所谓“左翼文化”的支撑而确立起来；这种说法依据的是一种政治意见的二分法，如果您晚出生几代，也会对它同样熟悉，并且它对称地把对习俗的尊重以及对性驱力的严密控制置于“右翼文化”一边。

您跟得上我吗？

但如果您确实跟上了我，您就会同时注意到这两个回答相似之处——对越轨的赋值——以及它们的差异所在：也就是说，在第二个回答中，对“强者”和“弱者”的参照被抹去了（“当涉及反对社会习俗的虚伪和对欲望的压抑时，强者有权对弱者行使自己的权力”）。对此，毫不奇怪：在一种左翼文化中，

它理应保护弱者（“被支配者”）免受强者（“支配者”）全能的侵害，人们不能同时颂扬反社会的颠覆和大人物对小人物的压迫——哪怕这种颠覆和压迫纯粹是象征性的，因为它们是通过文字、借助文学手段来实施，而不是通过行动来实施。

请允许我强调这一点：那些为了更好地突出施虐主义（或萨德式？）幻想的“颠覆”维度，而可能倾向于淡化“压迫”维度的人，若以它不过是支配关系的一种象征性再现为理由，那么在逻辑上，也必须接受“颠覆”维度同样如此：看来，从来没有任何社会曾因您的作品而受到真正严重的威胁，正如——套用有时在电影片尾字幕中读到的话（请原谅我又提到了一项您一无所知的发明）——“没有任何人在幻想过程中遭受痛苦”。简而言之：如果压迫不是“真的”，颠覆也并不更是真的。括号到此为止。

我总结一下：您那些少数读者，长期以来只是出于难以启齿的动机阅读您的作品，或者是为了以一种全然贵族式的伦理之名宣称某些人摆脱约束的权利，如今已经变成一大群读者；他们展示自己熟悉您的作品，不是以拒绝一切道德之名，而是以重视个人主义的、反社会的、反习俗的道德之名——一种由终于摆脱一切约束的性所体现的道德。说白了：变成“萨德式的”之后，“施虐的”就从右翼文化转入了左翼文化，而这似乎丝毫不让您的崇拜者感到困扰。况且，他们大概甚至没有察觉这一反转。

必须说，这条路早已被完全铺好，因为正是个人主义本身，在“进步”力量眼中原本是一种反价值，却在“抗议者”眼中变成了一种“价值”；这一转变发生在一场小革命之际，这场革命即便没有造成您所经历的那场革命那样深远的影响，却仍然搅动了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期的道德和政治价值体系，以至于促成了这种奇异的反转。并且也为您赢得了所谓“革命”力量对您同样奇异的热忱。

从这个角度看，您的情形不过是诸多例证之一（请原谅我如此把您降格为转喻状态）：在左翼文化中，凡是涉及法律之物都遭到去正当化，取而代之的是对越轨、颠覆、个人驱力与欲望的自由游戏的颂扬。但您已经明白，这是以牺牲那些保护弱者免受强者全能侵害的调节机制为代价的：在人与人或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上，是法律规则；在个体心理方面，则是道德规则，因为个体心理受到驱力的袭击，而面对这些驱力，人类有时需要由制度筑起的堤坝。

这想必会使您想起您一位同时代人、革命家拉科代尔的一句著名而壮丽的话：“在强者与弱者之间，是自由压迫人，是法律解放人。”毫无疑问，您选择的是自由一方，因为那是强者的一方。相反，今天颂扬您的人是否明白这并不是弱者的一方，则可以令人怀疑。

娜塔莉·埃尼克

莱斯利・卡普兰

– 莱斯利・卡普兰 –

电视上的萨德

侯爵先生:

有一段时间，我想象您受邀到电视上接受访谈。那就读一读吧[注1]。

> [注1] 以下文字摘自《玛丽的情人们》（*Les Amants de Marie*），巴黎，POL，2002年，第183-187页。

老萨德有点糊涂了，或者是受了糟糕的建议，竟会接受。

主持人会为了这个场合，在头上戴一顶小小的扑粉假发。

– 那么，侯爵先生，您还是喜欢鸡奸吗?

萨德，惊讶。

– 屁股，这确实是您的偏好，对吗?

您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说说，屁股的哪一部分是您投注最多的？洞？沟？臀瓣?

萨德摇头。

– 您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些偏好的?

您害怕过吗?

您肯定不是害怕他人的舆论，我们了解您，看见您的样子，就很清楚您谁也不怕，可是您害怕过您自己吗?

– 唔嗯fff，萨德发出声音，神情隐约有些震惊。

– 您更喜欢闭得很紧的屁股，对吗？不太被用过的？最紧的那些，啊哈哈哈?

萨德缩了回去，有点心不在焉，或者是不习惯演播厅的灯光，点了点头。

– 还有您对冰淇淋、果子露的喜好呢?

读您的时候，您的贪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萨德朝远处微笑。

– 您喜欢有点不同、有点特别的果子露，对吗？屎味的、便便味的果子露，您说您最喜欢的是这些？

再说，您认为说“屎”更好，还是说“便便”更好？

萨德扬起眉毛。

– 您对词语总是非常苛求，非常严谨，看得出来您热爱法语，您确实欣赏它，我说得对吧？

萨德耸耸肩。

– 我说得对，我看得出来您认为我说得对。

您把吃这些果子露时的快乐描写得非常好，您因快乐而呻吟，没错吧，不是吗？

我是说，您，您的主人公……

您的主人公，可以说就是您，对吗？

可是您忘了把做法告诉我们，啊哈哈……

– 唔嗯ff，萨德发出声音。

细心的观众也许可以看见他头顶上有一个小泡泡，里面有一个问号，就像某些漫画里那样。

– 那么，我们继续，继续，可说的内容很多，对吧，啊哈哈哈。

告诉我们，您特别喜欢多人关系，喜欢群体？

喜欢嵌套的、互动的姿势？

您会召唤各种各样的人，您认识的，您不认识的，仆人，王公，您喜欢混合，对吗？

这一切都需要下功夫，需要组织安排。您是一个非常有条理的人，对吗？看得出来。

要把这一切设计出来，毕竟必须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条理的头脑，不是吗？

这当然有点越界，但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可以理解。我自己……

带着微笑的沉默。

萨德无疑对这沉默感到惊讶，在椅子上动了动。

– 还有您对血、伤口、撕裂、强迫、制造疼痛的喜好，您能给我们谈谈吗？

– 唔嗯fff，萨德回答。

话虽如此，您会承认，这一切都需要人员、需要手段，对吗？

您得承认，只有特权者、相当富有的人，甚至非常富有的人，才能有这类消遣吧？

您说得不够，事实上您根本没说。为了让这一切真正能让普通大众享用，侯爵先生，毕竟还得重新思考基础设施，在这里我要给您提一点小小的批评，您没有想到大众的一面，照您呈现这一切的方式，它还不够民主化，不过也许这不是您的问题?

萨德点头。

– 然而在我看来，这很重要，甚至是根本性的，在我们的时代，我们不能绕开这一点，对吗?

总之，这一切都是爱，是通向爱的道路。

– 啊不，萨德说，他突然间像是醒了过来，啊不。

这是自然，萨德说。

– 爱，自然，是一样的，主持人说，微笑着，却语气庄重，爱，自然，是同一回事，而这正是美的地方。

– 啊不，萨德说，啊不。

自然不禁止任何东西，萨德说。是人们在禁止。自然，它不禁止任何东西，萨德坚定地重复道。

但是，萨德补充说，引用一句众所周知的说法，凡是被禁止的东西，按照定义，我强调按照定义，都是可能的。

主持人有一会儿有些茫然失措。

他重新镇定下来。

– 好，好，好，侯爵先生，您还是没有告诉我们，这一切您是怎么想到的?

给我们谈谈您的经历，好吗?

您能定个日期吗?

第一次?

据我们了解，您和您的母亲关系非常糟糕？再说，在您的一本书里，母亲是被缝起来的，对吗?

这是个人欲望的表达吗?

还有您的首字母，D.A.F.，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是这些首字母?

主持人继续说，他自问自答。

萨德疲惫了，不再说什么。

– 唔嗯fff……

谨致问候，

莱斯利·卡普兰

诸永恒

诸永恒

安娜・库德勒兹

– 安娜・库德勒兹 –

我在这里做什么?

亲爱的侯爵，在沙朗通精神病院的院子里，人们看见的并不是您的一座雕像，况且那里也已不再是一所精神病院了，现在人们说“圣莫里斯医院群”。石头的敬意在那里献给了异化病医生让-艾蒂安-多米尼克·埃斯基罗尔。然而，在 1998 年 9 月的这一天，当我来到那里，向接待我的护士们问道：“萨德在十九世纪初并直到生命的最后，确实就是被关在这里吗？”我在那里寻找的却是您。我不太知道自己该由此得出什么结论。人们会把我带进一场演出之中吗，就像当年您让那些与您一起被关押的疯人演戏，而公众从巴黎赶来观看这些表演那样?

我重新想起曼·雷在 1938 年为您作的那幅“想象肖像”中您石头般的面容，而我早已失去了自己的面容；两天前，当有人问我姓名时，它便同我的身份一起沉没了，那时我正试图连同身体与财物一起蒸发，让人以为我在一次恐怖袭击中失踪了。我已不再知道自己是谁，而我也真想知道您是谁。我以为自己可以顺着电影或书籍的标题来辨认方向，正是想着《爱我的人会坐火车来》，我才在 9 月 11 日早晨来到里昂车站，不很知道该登上哪一列 TGV，并觉得自己像萨特在《词语》中提到的那个没有车票的旅人。

人们把您关起来，是因为您的想象使社会处于危险之中，首先是在家庭这一初级形式中，但从未声称这是为了您好。我在您身上发现了一位被锁起来的兄弟，既被锁在一所监狱的现实墙壁之内，也被锁在那些并不稍减可怖的妄想之墙内；这是在读您的书信时发现的，在信中您试图破译所有预告您获释、或预告您妻子的背叛和狱卒们的可憎行径的“信号”。关于数字的妄想，关于词语的妄想，一切都可供您用来想象一条出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切开词语，朝出口走去；您是那样缺少空气，因为人们剥夺了您的散步。我从来不能理解那些批评家，他们把您的监禁看成您写作的活水源泉，甚至看成它的首要条件，仿佛这是您自己选择的。监狱，对您而言，首先是所有寄生虫、虱子、跳蚤、老鼠，是缺少您在信中索要的所有那些精致之物：换洗衣物、菜肴、水果、书籍；您对它们作了极其详尽的描述，您对它们的需要急迫，像伤口一样难以忍受。必须曾经被关押过，才会知道从外部到来的东西何等是一种奢侈，以至于人们不太知道该感谢谁，因为对另一种东西的缺乏已经感觉到了：干净衣物、外面的物件、精致糕点、“巴黎泥”颜色的背心……人们甚至可以痛恨整个世界，因为它不分担这种被削减的状态，因为它不预先想到要求，因为它不知道人们因这种幽禁而遭受怎样的痛苦。竟然有人能够相信并说这是出于您自愿，在我看来，这正是那些对他们而言监狱及其肮脏墙壁只不过是词语的人的特权。

“我在这里做什么？”这是我在沙朗通常常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而在相继三个政体把您关押其中的所有监狱里，这问题也一定多次穿过您，到了无疑足以使您的头脑裂开的地步，仿佛在您的笔飞奔于纸页之上、写下这部如此令人困惑的作品的同时，您也把头撞向了墙壁。这也是我读您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我不明白是什么把我留在这疯狂、这痛苦、这无度之中。我最初读的是《闺房哲学》，那时大约

二十岁，带着一种着迷的恐惧，把 Folio 版那册书收进抽屉里，被羞耻攫住，也被无法说出点什么的无能攫住。我和 ENS 那些那么自信、那么确信自己的趣味、自己的选择、自己存在的正当理由的小伙伴们，一起去看了《侯爵》，那是亨利·肖讷在罗兰·托波尔协助下拍摄的电影，片中人们看见您同自己的性器官对话，并且常常粗暴对待它。对于这处被包扎起来的性之创口，大概应该想出点什么来，但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而当我读您时，我仍然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做什么，并且越来越不知道。但我在那些读过您的人身上认出了您，他们把这种阅读作为一道伤口携带着，这伤口推动他们写作。

那些地下通道、地窖、地牢、刑讯室，我已走过上百次，也看见了所有用来使人受苦并享受强加于他者的痛苦的装置。我读过那些想要为恶辩护并消灭一切道德的哲学论文。对于许多萨德式人物，我赋予了我生命中某些悍妇的面孔，她们用诡辩且总是表面上慷慨的推理来为她们对我所做的恶辩护。至少，萨德式的放荡者们，就他们而言，并不试图让自己的受害者相信，他们折磨她们是为了她们好。性别在那时并不重要，在这种市集式的色情中，它同您所描写的、并且人们指控您实践过的那种越界色情只有遥远的关系。那些小脚的朱丽叶，无疑有绿色的眼睛和平直的脑电图，她们在徒劳的模仿中耗尽您那些恶之女英雄的力量。她们说着从您的小说中找到的生僻词，让我为我之所是感到羞耻，也为她们同我在一起时所是的东西感到羞耻，而她们又不愿承认这一点；她们没有从您关于自由与欲望主权的教诲中获得任何益处。是的，我在那些冰冷的床上究竟做什么呢？在那里，我的青春寻找一种意义，却在皱乱的床单之中，只找到权势者狭隘的伪善和自以为正统的善念。

我曾试图书写欲望，我曾试图书写疯狂，我曾试图书写混乱，仿佛在您之后这仍是可能的。我知道，必须冒着以厚颜无耻的方式一无所是的风险，仍旧并且永远扮演那个糟糕输家的角色。我读过那些在阅读您还不是一种可以承认的阅读时读过您的人；而福楼拜在我眼中变得更加“hénaurme”，因为他把自己的朋友们称作班多尔，这是您一个放荡者的姓氏，像在入会者的社团中给予暗号名那样。我喜欢您把“插曲”（épisode）这个词用作阴性，因为有些插曲，以其精美的残酷而言，事实上只能出自女人的头脑。我爱您的妄想，就像我爱我自己的妄想一样，因为它把我强烈地连接到世界，并阻止我死去，就在那里，当场，在那一瞬间；它给存在这架巨大的机器又一次震动，让它再活一天，但首先是再活一夜。

我没有穷尽您的想象，而《索多玛一百二十天》中对倒错及其变体所作的系统目录，预先就使我疲惫。您的那些女叙述者，随着她们进入卑劣行径的细节，在我看来变得不真实而抽象。我在那里所看见的，不再是别的，只是一个因匮乏和禁欲而受苦到失调的头脑的产物。您写作的全部补偿性维度在我心中激起一种疯狂的痛楚，因为人们让您形成的那些幽灵，至今仍萦绕着许多意识和受诅咒的场所。您书中对女性永恒的受害化，无法补偿您的岳母德·蒙特勒伊夫人对您造成的伤害，正如您不停地用各种语调揭发并哀叹的那样，而又从未超越您最初的无能为力，确切说来，也就是受害者的无能为力。我觉得某些先生声称自己被您的色情作品吸引，这很可疑，仿佛它只是一次进气、一股自由之风，而他们并不认真考虑，也不从其全部范围考虑，所有这些放荡者的壮举在他们身上激起的兴奋；这些放荡者的偏好常常是鸡奸。这个由转向男人的男人们构成、并实行对女性的蔑视与折磨性排斥的宇宙，到最后在我心中激起一种好笑，因为这种手法在我看来如此系统而幼稚。面对这种男人们彼此之间、自给自足的惊恐幻想，我再一次问自己，我在这里做什么，仿佛被困在一种其实与我关系甚少的迷恋之中，被钉在另一个人的欲望里；它阻止我接近我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解放它，正如整套话语

想让我相信的那样。虽然我长期以来曾相信，阅读您是一种清醒的练习，而且并非没有某种伤口，如今我却在其中看见一种对盲目和顺从的同意，一种在自身内部重建您写作时围绕在您周围的墙壁的方式。

因此，我不认为我还会重读您，这无疑同年龄问题有关。我已没有时间留给那些大部头的反复念叨，留给那些无穷无尽的姿势清单和摧毁一切的论据；我宁愿拿拉罗什富科的一条箴言，去抵您数章，因为在那里，人们永远抵达不了厌恶、过度、恐怖的尽头。您的傲慢使我心寒，而我已不再感知到某些人在您身上赞颂的精致；他们培养这种悖论的趣味，仿佛在他们论证的有效辩证法中，一切都可以翻转。在发现罗贝尔·安泰尔姆和普里莫·莱维的作品之后，我已无法毫无保留地阅读您；而我的生命太短，不能献身于这种非道德的虚无主义，根据它，唯有最坏者才是确定的，并且它已经认可了这最坏者。我保留着您作为一个笔之人的形象：在词语中发明自己的幸存与自由，在那里，他想象自己的人物夺去受害者的生命，并把她们变成自己欲望的奴隶。您曾是我的狱中同伴，在您的疯狂中接纳我，并给我的疯狂留出一个位置，仿佛为了减轻它对我爆裂的头颅和我不可解释的心所造成的打击与冲撞。但今天我写给您的，是一封告别信，因为混沌（chaos）令人疲惫，而我已有太多事情要同存在中无数的颠簸（cahots）周旋。[注] 倚靠着您的忧郁，我的忧郁随着岁月找到了离席的力量；而您将成为我书房里的幽灵，在或许已把我从自己的锁链中解放出来、并让我扮演了您残酷剧场中的所有角色之后，摇动着您的锁链。

> [注] 法文此处以 chaos（混沌）与 cahots（颠簸、震荡）构成音近双关。

安娜·库德勒兹

埃尔韦·卢瓦什莫尔

– 埃尔韦·卢瓦什莫尔 –

阿维尼翁，2014年7月14日

我所致信的，是您，6号先生，

对我们来说——不仅对我们这一代人，对我们的父母、祖父母以及在他们之前的许许多多其他人来说——您曾是一个丑闻的名字。一个被流放到监狱、疯人院或图书馆地狱里的魔鬼。尽管被囚禁，却仍继续躁动并说话。

对曾想象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我们来说，您是不可收编者，用一种如今已被遗忘的词汇来说。某种任何时代都无法消化的东西。一个保证：任何制度，无论多么强大，都无法毁灭您所体现的那片区域，微小、秘密、受压迫，却最终注定遭受憎恶。那种确信：这个，谁也不能从我们这里夺走。

严重的错误。我们生活在一个把一切都变成金钱、回收一切、并且能够消化一切及其反面的时代。包括您。因为您也逃不过这场大甩卖。

如今您成了一座文学纪念碑，成了我们文化史上一个我们正准备庆祝的关键时刻。我并不反对标志着您逝世周年的庆典——我正是在这个框架内给您写信——也不反对您进入“七星文库”，但这种承认充分说明了我们的处境，以及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之贫困。

我们会在2040年庆祝您诞辰周年吗？我并不相信。那时我们早已把您从视野中丢失了。

谨致问候，

埃尔韦·卢瓦什莫尔

让·阿卢什

– 让·阿卢什 –

巴黎，2014年11月6日

亲爱的多纳西安-阿尔丰斯-弗朗索瓦，亲爱的侯爵，

我是否要向您承认，在巨大的错误与大师之举之间，我放弃作出裁断。不过，我并不放弃向您的举动作出致意；这个举动近乎独一无二，毫无疑问极其罕见。它打动了许多头脑与心灵，然而人们从来既不知道它是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接待它，如何给它以应有的位置。侯爵，您拒绝了坟墓。

要让您的身后之人做到这一点，可不是一件小事……刚刚死去之际，后来，以及直到今天，您曾不得不付出、仍不得不付出多少努力，才能使您的愿望有朝一日终于实现：让您的一切痕迹从地球表面消失！两个世纪已经过去，专门用来不满足一个临终者这项然而如此正当的要求。1814年12月6日，人们决定无视您遗嘱中所列的明确指示。违背您的最后意愿，人们把您葬在沙朗通济贫院的墓地里，不过到底并不完全像一个好基督徒那样，那还不至于！因为，当，*horresco referens*（说来令人战栗），某个名叫若弗鲁瓦的神父，怀恨在心，怒气冲冲地在您的墓上竖直插下一枚十字架时，人们却没有在上面刻上您的名字。您的下葬是一种妥协，而这不是好兆头。

这是一个幸运的偶然吗？是您插手了吗？无论如何，四年过去之后，1818年8月中旬，这座墓地本身也将被一扫而空。有那么一刻，拉蒙医生，那个在您儿子身旁陪伴您度过最后时刻的人，曾能把您的头骨握在手中。他跳进尚未封闭的墓穴，就像哈姆雷特跳进奥菲莉娅的墓中一样，将它夺到手，又以它自饰；并且，作为加尔的弟子，把它带到他的单间兼实验室里，而这实验室当时不是别处，正是，绝妙的讽刺，您在沙朗通精神病院里的旧房间。几乎是一次回家，回到那个地方；在那里，凭借您那可爱的来访者兼同谋者，您曾燃起您最后的力比多之火，当然是一个玛德莱娜，因为这个名字仍如此有利于亵渎。于是，您的坟墓之所以能够被消灭，只是由于它一并带走了一座精神病院墓地的一切痕迹，使它们进入无痕的幽暗黑夜。*Post mortem*，死后，您再一次懂得如何过度。然而，人们不能忽略的是，还剩下您的头骨，它逃脱了埋葬，并被许诺给一个美好而奇异的未来，注定要重新出现不下六次；就在最近，我不还在那种豪华酒店免费提供给无所事事的客人的铜版纸杂志之一里看见过它吗……

那么，您写下这样一个愿望时，究竟是在着手做什么？这是那些喧闹而暴烈的怒火中的最后一次吗？孩提时，您曾任由自己沉溺于这些怒火，它们解放您，哪怕会使您亲爱的父亲在他所侍奉的人面前陷入极大的窘境？这对您来说无关紧要！即将到来的死亡，是否让您，倘若就您而言这还有可能的话，侯爵，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狂怒，并因此推动您写下这份可怕的遗嘱？但我离题了，并且以这些怒火来提醒您，令您不胜其扰；请您原谅，我请求您，我要求您这样做，您这个如此善于、如此漂亮地、如此幸运地从来不原谅任何事的人。

请允许，我继续，我重新收住自己，以便抓住您，是的，抓住您，就在这个地方本身；它并不是一个地方，它只是任何可能性之缺席：不可能前来向您致意，不可能在您身旁默祷，甚至不可能让您保持在您今天所处的状态中；而这个状态，由于这座缺席的坟墓，作为一个不知游荡在何处的幽灵，我把定位它的任务留给您，让您通过占据它来定位。您能够做到，不是吗？您已经成为的这个独特幽灵能够做到；直到今天，它仍萦绕着每一个人，至少在西方如此。

您会同意，它与人们通过发明一种极不合时宜的、并且就您而言令人恼火的施虐主义而把您变成的东西毫无关系，它丝毫不受其牵连；这种发明给您如此遭受虐待的名字带来了不幸。您可知道，这样一个顽固的实体（我在押头韵！）生命力很强，尽管确实有某些英勇之人曾试图给这个皮囊放气，虽说基本徒劳无功？但让我们撇开这一点。我寻找您的地方，并不是那里，不是在这片坍塌物中，不是在这团糊状物中；而如果您允许，我也不会在那里找到您。

亲爱的侯爵，您如今是三个，而且彼此分离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人们不禁要问，连接它们的线是否早已断裂。在这一点上，您也使我无力裁断。再说，裁断又有什么用？更接近您曾经并且仍然如此渴望的那种彻底消失的，是您的尸体；关于它，人们要问，大地所容纳的那种群集蠕动的生命，是否已经把它完全吸收；无论如何，那是一具注定走向某种无定限消融的尸体。抵抗这种消融的，是您的第二个实例，这个头骨；当它出现时，人们已经不知道它是实在的，还是纯属虚构。您的第三个实例，是我正在写信给它的那个，而我甚至不知道该把我的信寄往何处。游荡的幽灵，每当人们谈论您、书写您时，您是否就应召现身？我感觉到，您此刻读到我时正在抗议；您要求作为幽灵也同样自由，正如您活着时，作为一个何其肉欲的身体，曾经自由那样。我乐意承认这一点：您只对某些召唤现身。而决定此事的，正是您自己，没有别人。

您的一位伟大前辈，勒内·笛卡尔，他也是三个。您知道吗？他的骨架，头骨已从其中分离出去，从未重新合一。他在我们这座善良的巴黎城里享有两座坟墓，如果这里能够谈论享有的话；在这座城里，那座巴士底狱，曾如此强烈地激发您这位文学家，不知通过什么魔法，已经变形为一座歌剧院。昔日恐怖的呼喊，今天变成了音乐。那座巴士底狱，不正是您最后的缪斯吗？我由此推断，笛卡尔也作为某种幽灵，由于像您一样变形成一个三位一体，便由此为您的最佳读者们所承认的东西提供了担保：您心灵那种极其理性、合乎逻辑的性质。

我并非在告诉您什么新事：幽灵有不同类别，有些乖乖蜷伏在那个据说仍存有他们活着时充当身体之物的地点；他们离开这个下界时没有债务，既无须偿还，也无人须偿还给他们，因此他们平静地等待，为的是终于消失，等待地上再没有任何人对他们曾经是什么保有丝毫记忆。另一些，相反（是的，相反），在这里那里游荡；在这些幽灵之中，有些比另一些更为活跃，甚至会引导活人的行程，有时还骚扰他们，可怜的活人，他们往往对此无可奈何。这一切并无新意。因此，我在这里提及它，只是为了告知您，您们三个与三个笛卡尔之间有一个重要差异（这个词末的“s”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它的理由）。后者，倘若说他们听任笛卡尔主义发生，作为一种简单方式来指称与这个人的作品有关的东西，而此人像您一样在战斗面前并不退缩，却从未允许人们发明出那种本会被称作笛卡尔症，或者笛卡尔主义症（但这可真长）的病理学；这样一种疾病，然而本可以与灾难性的萨德主义[注]构成对应，即便不是对位，并且不过是那种真正的、可怕的、可悲的残疾的另一个名字，而尼采称之为柏拉

图主义。您的幽灵是否曾经，哪怕违背您自身，助力于那些发明萨德主义的蠢人，或者至少，*a minima*，由于某种不知名的疏忽或冒失所造成的效果，听任他们这样做？您读得出来，我是在逗您，不过还没有到虐待您的程度。

> [注] sadisme 通常译作“施虐癖”，词形由 Sade 派生。本段把它同作者拟造的 descartésisme、descartésianisme 等病名对举，因此正文作“萨德主义”以呈现姓名的派生关系，并不将它当作萨德提出的一套思想纲领。词形参见 CNRTL 的 sadisme 词史条（法语）。

我的信，或者更准确地说今天这封信，因为许多年前我已经给您写过信，是否将获得非凡的特权，能在其中找到您，亲爱的幽灵，被召唤而来，在场？这会发生，而且为人所知，尽管人们完全无法知道这是经由什么途径被知道的。无关紧要。您曾应让-雅克·波韦尔、安妮·勒布伦、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以及少数其他人的召唤而起身；他们大概并不多，也就是我在信函开头称为英雄的那些人。

至于雅克·拉康向您发出的召唤，我不太知道情况如何。它是否使您暴怒？使您无动于衷？它是否令您欣喜？您会回答我：但这该由您来告诉我，既然是您提出这个如此有趣且正当的问题。那么，好吧。不过我在发抖，因为此刻我已经处在您的位置上，既然您刚刚把我放到我的位置上，而我不能逃避这个位置，却也不能把自己囚禁在那里。因为这个色彩鲜明的人物，这位嗓音并非清亮而是金属般的花花公子，对您采取了极其居高临下的态度；当然，这是您不能容忍的。冷静些，亲爱的侯爵，作为幽灵，请吸收一点点耐心；您在地上的生命曾如此坚决地排除了这种耐心。您曾是卓绝的急躁者，您仍然如此。

这个雅克于是把您同我们哲学家中最拘谨的一位联系在一起，说“绑定”会更准确；到这位哲学家的家里去，人们若不脱下鞋子便不能进门。这个哲学家，当他交媾时，无疑也只会花上狮子用于这项活动的那几秒钟，而且丝毫不像是在享受它。您的鞋子，您会同意把它们留在这个门槛上吗？我很怀疑。因此，人们给您指定了一个悲哀而苦干的同行伴侣。苦干，并不是您所理解的那个意义。人们很难想象这个人会像您一样、同您一起思考，同时还完全赞同苏格拉底的两种精液理论，即女人同男人一样也可能操出、射出，因为这同样也是您的词。把您们二人联系在一起，人们是在耍弄您吗？谁敢这样做，谁还敢这样做，谁就不幸了……

人们并未止步于此。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此之前，人们也已经把您拴到另一个人身上，一个小说小文人，如果他的出版物，不论其成功如何，配得上这个名称的话。这个人物也同样规规矩矩，相信夫妻之爱，相信其德性。人们也乐于把他的名字延长成一个“主义”，仿佛是为了更好地让你们二人彼此同声共鸣。

于是又有其他英雄起身了，一位女人，她推倒了一切“主义”；一位哲学家，他坚持要把您同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小文人分离开来。

自此，我向自己发问，也由此向您发问。您，如今已是三重的萨德，在这个举动中是否有某种责任：这个举动至少两次导致您同另一个男人联结起来，并且看来是联结到永恒？您是否通过拒绝坟墓这一共同制度，而使这件事成为可能？

您卓然是那位“不规则者”；一位伟大的法兰西哲学家曾越过大西洋直到布法罗，在那里把您呈现为一个不承认自己之上有任何主权的个体。然而，我不能把这番话当作仅凭自身便解释了您对坟墓的彻底拒绝。

而现在，给您写信使我豁然明白。我如今抓住了，*尤里卡！*，您那著名拒绝的真正理由。我此刻想起，您曾把自己描述成一匹纯种马，注定要参加最伟大的赛马，却会被人一连数日关在马厩里。*疯狂！*，您说，*悖理！*，对此人们只能赞同。还有什么比指出如下事实更合理，或者更好说，更像一个理性之人，也更有道德（今天人们说“伦理”，同时想着“道德”）呢？您所指出的正是：若让这样一头动物每天有足够时间在草地上随意嬉戏，它给周围母马、给饲养者，并且说到底，给整个社会，动物的和人类的社会，造成的问题就会少得多。

并非往坏处想，我是说，想到您，一位哲学家承认您有理；这匹纯种马，他把它命名为狄俄尼索斯，并细心地给它献上一片草地，好让它在那里倾泻其过剩的享乐。这片草地绝不可同一种后来的妄想所命名的“真理的林中空地”相比，它也从他的笔下得到了一个名字：*阿里阿德涅*。这种快乐的知识，我毫不怀疑，曾使您欣喜，您对精神性的太阳之下所有新近发生且至关重要之事都了如指掌，那是正午的太阳，是您的南方之太阳，也同样是我的，即便您在那里那座城堡直到不久前还和我从未拥有过的那座一样破败。这位哲学家，这位行路者，这位反刍者，是的，曾使您着迷，何况您的知识也同样快乐，您真正的朋友们知道这一点。

但我回到我的阿里阿德涅之线。那么，难道您不是把您的坟墓设想为这座使用得如此糟糕的马厩，这座不是提供无辜嬉戏所要求的食物和休息、反而囚禁起来的马厩？如此一来，您在死亡中所做的，便无非是把引导您一生的东西延伸到您死后：高于一切，绝不忽视您的自由。纯逻辑的问题，正如人们喜欢说的，却不问纯粹性在这种自称只是简单且脱离意义的字母游戏中究竟来做什么。但在您的自由所作出的、并且为了您的自由得以存活而作出的这个正当决定中，还有另一件事。

请允许在此作一个简短的绕行。对于如此沉重的基督教，您曾经并且现在都像极少数人那样熟知——您当然不是那种一开始就会被造成罪人的人。不过，对于伊斯兰，或许并非如此；就此刻对我重要的这一点而言，伊斯兰本身则是如此轻盈，并且，我敢写给您说，对您也同样重要。一名穆斯林在按仪式被清洗之后被带到墓地，然而，在他被放入已经挖好的坟墓之前，伊玛目或某位高度权威的人会向众人高声说出以下两个问题：“我们即将安置入土的这个人，是否曾缔结过一笔尚未偿还的债务？”还有：“是否有人仍欠着他的债？”因为“信徒的灵魂是其债务的奴隶，直到债务清偿为止”，先知的见证者布哈里如此说。若这两个问题中的每一个未能得到否定回答，尸体就不被埋葬；它不可能被埋葬，因为，正如人们所说，既然生来无债，也就应当无债地离开这片土地。

我敢打赌，您正是以这种 *muslim* 的方式构想了您的坟墓之可能性：一个地点，如果它曾在某处被建造起来，就会意味着一切账目都已经结清。显然，事实并非如此，您会同意这一点。人们欠这匹纯种马某种东西，正是这自由，除此无他；这自由曾被如此粗暴地剥夺，那四十年的幽禁，即便在死亡中，它也不能忽视。死亡并不解决进行中的事务，唯有第二次死亡才会做到这一点，而您的遗嘱曾徒然地想要使您接近那次死亡。因此，拒绝坟墓时，您付诸实施的仍然是您的自由。但代价是什么？

您的幽灵不能停留于其中，不能在那里安息。像哈姆雷特父亲的幽灵一样，它也在此游荡，不幸与否，我不知道，愤怒，这一点毫无疑问。因此我确信，它像哈姆雷特父亲一样严肃地记账；也就是说，您在记账，并且极其细致地把向您发出的召唤分配到两类之中：一边，第一栏，是那些顾及您自由的人；另一边，第二栏，是那些把您关进马厩-坟墓并使您嚎叫的人。

亲爱的多纳西安-阿尔丰斯-弗朗索瓦，亲爱的侯爵，若能不久从您那里得知，您已把我列入这第一栏、这人数如此稀少的一栏，对我来说将是莫大的幸福和荣誉。

在等待下一封、并且对我而言幸福的回信之际，亲爱的同道与朋友，请相信我是您忠诚的仆人。

让·阿卢什

弗朗索瓦·奥斯特

– 弗朗索瓦·奥斯特 –

“全世界终将知道我曾受到何等不公正的对待”

艾克斯，2014年6月27日

亲爱的侯爵：

我不知道这封信是否会送到您手中。说实话，我不知道该寄往何处给您。

我本可以把它托付给“留局待领”，但我怀疑您是否会去取，尽管收到您忠实律师戈弗里迪的一位后裔的消息，无疑会让您高兴。

寄往天国？说得倒轻巧！尽管您那“*神圣侯爵*”的称号无疑会使这封信的投递更为便利。说起来，您知道这个称谓吗？我不认为您的同时代人在您生前曾把它加诸于您。那么请知道，如今人们正是以这个称号认识您，大概一半是嘲弄，一半是神圣的恐惧——人们只借给富人，不是吗？

不过，您到圣彼得那里去做什么呢？萨德在天堂，得了吧！除非，我想到，那个天国居所恰恰是对您所有罪行的惩罚？天国，作为再教育的居所。萨德，被判处天堂，无期强制祈祷——而永恒很长，尤其到最后时，更长，正如那位幽默家所说。普通人被判入地狱，可您，您不是普通人，您看重的是例外。那么，人们会判您永恒地听三钟经，无限地唱哈利路亚……我想象您，赤着脚，双手合十，身穿白袍，举目望天。还有圣多明我，异端皈依的冠军，会被亲自指派负责您的再教育。每天早上两小时布道——“平安地去吧，我的孩子”。不过，在这场游戏里，我不确定他会成为赢家——我倒看见他三个月后便认输，被您的恶意和诡辩恶心得不行——“去他妈的吧，神父！”而且，若得知您竟能在一次讲道正中间勾搭某个年轻初学生，我也不会惊讶，正如安娜-普罗斯佩尔，您的小姨子，您曾把她带到意大利，并乐于在那些赤裸阿波罗的景象前使她脸红。得派一支小天使军队来监视您，而圣弥额尔和圣乔治来统领他们也不为过。不会的，仔细一想，您污染天国本身的风险太大——您的位置不在天堂。

那么您会在地狱里吗？这倒相当合乎逻辑，您甚至会在那里占据一个荣誉席位，在那座大烤肉房中央，操纵着碾碎您这类 roué 的车轮。[注] 终于，为恶而恶！您或许会像朱丽叶那样欢欣，终于摆脱朱斯蒂娜的痛苦主义，同时既是受害者又是刽子手，注定遭受无限的凌辱与酷刑。地狱，欢愉的王座，一切乐事的许诺，受苦者的港湾，地上受诅咒者的避难所。您会在那里同无数教皇、枢机主教、主教、修士和女修道院院长欢聚为伴，他们都曾被您安插进您的小说。您会在那里过着奢华生活，就像您的神甫叔父在索马纳那样，带着他的娼妓夜会。我很能想象您颁布一部《地狱条例》——一切都会被规定好，如同在所多玛，在最细微的细节中：刽子手与受害者的轮换，刑罚的确切性质，欢愉那经

过精心研究的递进。然后，当然，还有不遵守条例并任意惩罚的权利，额外享乐的来源。地狱，如同伟大的自然，那发生重大地震与火山爆发的自然，那些摧毁一切又重新创造一切的巨大灾变，终于是伟大的死亡，如同一个永不结束的高潮。

> [注] roué 可指“浪荡子、败德之徒”，也关联轮刑；此处紧接 broie 与 roue，形成“车轮碾碎 roués”之双关。

可是，再一次，更仔细地想，我看不出您在地狱里；也许您曾在那里逗留过一段时间，但我猜想撒旦必定忌惮您对他的住客们所具有的支配力。把一切痛苦都转化为快乐，并无限地享受那蔓延的恶，这就不成游戏了！——所以您竟会成功地颠覆地狱本身。而如果上帝已经放弃，撒旦——若我敢这么说——也没能支撑多久。我想象天国与地狱之间往来的信函和外交使团：人们该拿您怎么办？该把这个魔鬼般的人关到哪里？有一刻，某位使者，精明的谈判家，别西卜，除非是您的主保圣人圣多纳蒂安，一定曾想到把您的死亡无限期推迟：像飞翔的荷兰人，在生与死之间漂泊，如同一个不得安息的灵魂，直到永远。不过，据说，这个决定只能在有关之人死亡以前作出。然而，您确确实实已经去世了，在1814年12月的那个夜晚，正是这个事件使我们今年得以纪念其二百周年。

所以，您仍是那个碍事的人，那个无法归类的人，如您一生所是：在侯爵夫人中间是个流氓，在无套裤汉中间是个贵族，在闺房中是哲学家，在疯人院里神志健全，而如今又被上帝和魔鬼拒绝——彻底成为 *non grata*。因此我想，在走投无路之下，人们必定把您流放到了炼狱，所以我也就决意把这封信寄往这个地址。

是的，就是这样：炼狱；这片流放之地，这个 *refrigerium*，人们在那里安置普通人和棘手个案，这片 *no man's land*，人们在那里禁闭那些关于其命运那架大天平始终无法定夺的人，在恶习与德行之间无限期犹豫；您如此成功地把一切都搅乱了，以至于当局会把您的案子置于无限期的审议之中——等到所有这些骚动都平息之后，在某个遥远的日子，人们再看看该拿您怎么办。

就我而言，我并不相信这是个好办法。首先，我想炼狱里人很多，都是像我这样的人，不够坏到进地狱，又太不信教而进不了天国——把您送往炼狱，因此就是给您提供一大批听众，而且还是一群脆弱的公众。人们不难想象，您会把这些“涤罪”之所用于千百种不大可取的用途。此外，若希望您有朝一日会厌倦，那真是太不了解您了。相反，我看见您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作品重新放回工作台上，再度积累成千上万页，向栖居在这些有点阴郁地区的一队队可怜人慷慨陈词，在惊愕的观众面前上演戏剧，不知疲倦地让狂暴自然的巨大管风琴轰鸣起来，鲜血再次奔流成河，淫荡的洪流再次被释放，而在这些您熟知其秘密的巴洛克式大弥撒的背景中，那通奏低音不倦地重复着：“享乐吧，不管以什么方式享乐，不管以谁为代价享乐。”我很愿意打赌，有一天这阵喧嚣会重新传到天国和地狱，而您所挖掘的深渊终将刺破这个人们极不谨慎地把您流放于其中的炼狱外壳。您看见了吗：历史上第一次，被流放到炼狱的人们不再向往天国！到那时，人们势必得重新打开您的档案。也许人们会把您送往印度，怀着希望让您在一个获得再生的存在的皮囊里重生：一条蛇，或一只虎，一头象，或一头圣牛……

我是开玩笑；在此期间，由于没有更好的主意，我写信给炼狱中的您。

说起来，我还没有自我介绍：弗朗索瓦·戈弗里迪，加斯帕尔-弗朗索瓦-泽维耶·戈弗里迪的远裔，他是那位忠诚的律师，在那个时代的所有风暴中都始终忠于您，尤其当那些“拉科斯特的乞丐”，如您称呼他们的那样，在那些革命岁月占据您的城堡时，而您自己当时戴上了红帽，正在创作您献给马拉和勒佩勒捷的颂歌。我在家族档案中找到了几份以您为名的厚重卷宗——封面上有一张标签，用漂亮的红墨水写成。确切地说，这正是我这封信的来意，这些卷宗给我提出了一个良心问题。刚刚在艾克斯以您的名义开张的新博物馆的馆长，如今请求我允许把这些文件提供给公众和研究者使用。我承认，我觉得自己无权独自作出这个决定，而您若能给我只言片语，我将感激不尽。

也许您会惊讶，竟有人把一座博物馆献给您本人和您的作品？亲爱的侯爵，您应当知道，您曾在遗嘱中表达过极其坚定的愿望，希望消失而不留下痕迹——一座很快被草木覆盖的无名坟墓——但这愿望完全没有得到遵守。今天，您享有世界声誉，而您家族的姓氏如今，若我敢这么说，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通名词：“施虐癖”这个词几十年来一直出现在我们的词典里，意思大致是“通过有意施加给他人的痛苦来寻求快乐”，其同义词有“粗暴、残酷、恶意”——承认吧，这对一个其姓氏本来意味着“温柔而愉快”的人来说，真是莫大的讽刺。

您的作品如今已经全部出版、评注、翻译。关于这一点，您无疑会高兴地得知，您曾在其上以蝇头小字誊写《所多玛的一百二十天》手稿的那卷纸，在柏林一位精神科医生藏书的公开拍卖中被重新发现，如今在七星文库版您作品全集那三千页中占据显著位置——这是出版方面最上乘的版本，“用圣经纸印成”，正如广告所说明的。

您的继承人，在好几代人中装作与您毫无关系，如今则毫无顾忌地承认您那显赫的姓氏。我们美丽的普罗旺斯的一款葡萄酒以您命名，而您的城堡，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所剩下的东西，已被一位著名时装设计师买下，他在那里一到夏天便举办颇受欢迎的戏剧和音乐节。啊，要是石头会说话！我想它们会回响出别样的放肆之举，回响出您曾在这里上演的所有这些疯狂。

说实话，您的剧作，那些您在大革命期间如此想在巴黎上演的剧作，当时您自称“路易·萨德，文人”，其实并没有真正越过舞台脚灯；无疑是您把它们过分“罩上薄纱”了，如您所说，为了糊弄观众而把它们冲淡了。说实话，恕我冒昧，我认为当您不让自己被这类顾虑拖累时，您更出色。

相反，得知这一点无疑会使您觉得有趣：虽然您的剧作没有上演，您本人却已经成了戏剧人物；有一部让您同马拉对峙，另一部则把您同您的妻子勒内-佩拉吉一道搬上舞台；甚至还有一位比利时作者声称，在恐怖时期最高潮的日子里，您曾在皮克皮斯寄宿所，也就是科尼亚尔医生的疗养院，住过几个星期，试图在那里让罗伯斯庇尔忘掉您，而且您同让-艾蒂安·波塔利斯进行过没完没了的谈话；他同我们一样是艾克斯人，后来将成为《民法典》的主要起草者。

总之，您的作品广为人知，并激起一种始终不减的兴趣。我很想知道，面对这股评论的洪流，您会作何反应。因为今天人们把您调进各种酱汁里；真的，您可以自夸把批评界弄得发狂。在长期作为“臭名昭著的《朱斯蒂娜》”的作者、作为那个患有“淫欲性疯狂”的受诅咒作家之后——福歇当年不经审判便把您扣留在沙朗通时就是这样声称的——整个 XIX^{e} 世纪，您一直是那些“用一只手阅读”的书的作者，是那些占据图书馆“第二排书架”的书的作者（那些看不见的书），是一个人们装作不认识、却

施加着一种隐秘影响的作者，而只有最伟大的人物，如波德莱尔或福楼拜，才承认这种影响。随后，您开始引起精神病学的兴趣，而您所描述的索多玛六百种激情，在您进入词典的同时，也成了疾病分类学的范畴。

然而，二十世纪将把您从阴影中带出来，并把您从这些医学标签中解放出来；我们的超现实主义诗人会在您身上看到一切革命的旗手，而从此以后，您将同许多会使您惊讶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不过，心态演变得很慢，出版商波韦尔在1954年第一个冒险推出您某些文本的公开版本，却仍将遭到起诉和审判——这又是一桩可加入您收藏的审判。但是，这一次，动员是全面的，巴黎所有堪称才思俊雅之士的人都拿起笔来捍卫您的散文，而出版商则被免于追诉。

从那一天起，这股激流再也没有停下，每个人都声称掌握了您作品的钥匙，并对您的人格拥有最后的话语权。您想想看，人们甚至把您说成某种神秘羔羊，替人类罪孽赎罪的牺牲品。另一个人写了一大卷资料翔实的书，题为《道德家萨德》；是的，您没有看错：《道德家萨德》——您所叙述的一切恐怖，其唯一目的竟会是使我们远离犯罪——啊，那可真是呢！还有些人在巴黎沙龙里装出一副完全不为您的文学所惊吓的样子；言下之意，他们以居高临下的神气表示，什么没见过呢，而且归根到底，您对宗教之物进行揭发的那种执拗，透露出一种再也骗不了任何人的秘密依恋——一位伟大的精神分析家已经这样说过，于是所有人都开始以相信这话为己任。

或者相反，人们在您身上看见了那些大屠杀的先知，甚至间接代理人；那些大屠杀可是真真切切的，而我们刚刚离开的那个不幸世纪，唉，已经把它们堆积了起来。

幸而，也有另一些人开始严肃地阅读您：关于您，已经写出了非常完备的传记；极为精心的批判版本正在流通；也有人提出深刻而不哗众取宠的评论。人们研究您的风格及其语词误用，人们探究您那极其复杂的两种自然理论，人们审视您同法律之间的矛盾关系（有人写道，这是在否认与复制之间的跷跷板游戏），人们追踪您对雌雄同体者的迷恋，后者挫败了性别的划分，因而也挫败了象征的流通。有人把您说成一种“倒置的巴洛克”的导演：肉的群山，最炽烈的光线，无穷无尽的堆叠，取之不竭的能量，整个一切都被卷入无底深渊的眩晕之中——一种朝向下方的吸引，一种倒置的超越，世界屁股翻到头顶上，置于一场惊人的“风俗的下形而上学”（cataphysique）之中（*cata*：在后面并在下面）。[注]

> [注] “cataphysique”仿照“métaphysique”（形而上学）构词，又由括注中的 *cata* 指向“后面、下面”，故译作“下形而上学”并保留法文。

我向您讲述这一切，是为了让您衡量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激起了兴趣，而这也解释了您那座博物馆馆长为何如此坚持。

所有这些文字无疑会使您大为惊讶，也许会使您恼火，而且当然也会使您觉得受宠若惊。但也许，您从如今所在的那个居所，还在为我们准备着完全别样的东西：某个足以让路西法本人脸红的故事。

眼下，亲爱的侯爵，我想知道，您是否同意公开您同我的先祖通信的档案；无意冒昧，我提醒您，其中有一些大纸箱涉及您的岳母蒙特勒伊主席夫人，也有各种同艾克斯审判有关的文件和信件。也许您并不想让其内容传扬出去。

您忠实的受惠者，

弗朗索瓦·戈弗里迪



艾克斯，2014年7月21日

亲爱的侯爵，

您的回信我已顺利收到。所以我并没有弄错，您确实是在炼狱里；而且我注意到邮戳上写着“斯特龙博利”。民间传说因此说中了：炼狱的确位于这座火山之中。我为您感到高兴，您正浸没在一种您常常描写的元素里。

我郑重记下您的授权——“全世界终于会知道我曾受到何等不公正的对待”，您这样写给我。我谨代表您那座博物馆的馆长，以及他周围的研究者们，向您致以诚挚谢意。

我还会按照您的建议，让人以“隐秘包装”给您寄去一令纸和墨水，您对我说，有人“残酷地剥夺了”您这些东西。我随信附上我曾向您谈及的那位比利时作者的剧本，它似乎引起了您的兴趣。

仍是您极为忠实的受惠者，

弗朗索瓦·戈弗里迪

附言：我没有找到您要我去药剂师那里购买的 m. 匣，以及 t. 软膏。我会继续寻找。

诺埃尔·夏特莱

– 诺埃尔·夏特莱 –

亲爱的侯爵，

那么，这封信将是最后一封。

毫无疑问，我的错误，是我在1813年12月2日对沙朗通的那次探访，那正是您去世前一年，日子一天不差——这已经是一个征兆了吗？——也是我当时离开您时，在您房间门口，在男人馆二楼，给您的那个“承诺”[注1]……

> [注1] 见诺埃尔·夏特莱，《与萨德侯爵的访谈》（*Entretien avec le Marquis de Sade*），巴黎，Plon出版社，2011年。

确实，把您遗弃在那里，遗弃在那个地方，如此孤单，如此可怜，曾使我异常动容。

这简直让人相信，共情是个糟糕的顾问。

请您不要误会：您知道我对您的感情，也并非不知道我曾多次竭力说服您那些永恒的诋毁者，让他们在您身上区分出人和作家，而不要把您化约为附着在您名字上的野蛮与残酷的形象。

我一直尽我所能，为您这位预言性的哲学家辩护；在我眼中，您就是这样的人，而且也将一直如此。

但看来，与萨德侯爵交谈，终究不可能不受惩罚。

今天，我苦涩地确认了这一点。

这并不是因为没有人预先警告过我！

我的分析家难道不是一开始就提醒过我，这样一项事业可能存在的风险吗？

但我已经承诺了，而您知道我的固执。

然而，必须承认显而易见的事实：够了就是够了！

啊，梦！梦啊，我亲爱的侯爵，是如此……会说话，而夜晚又如此……人影憧憧！

您对自己的“幽灵”哲学思考得如此出色，我可不会向您解释它们有多么可怕！

一言以蔽之，明智要求我遵从我灵魂医师的意见——不如说命令——因为据说，我的精神已经处于太大的紊乱之中。至于我的理性……

我请求您不要对我的背弃过于严厉地责怪我。

并且我恳切地请求您，烧掉我寄给您的所有信件（通过您知道的那个人），包括这一封；我自己也会烧掉您寄来的信，我必须承认，这并非没有一阵心痛。

您真诚的，

诺埃尔·夏特莱

莉迪亚·巴斯克斯

– 莉迪亚·巴斯克斯 –

我亲爱的爱人，

现在正是把我们的心与肉体向那最终拥抱敞开的时候了，它将把我们两人一同带往地狱。三百年的谴责把你竖立成殉道者的榜样，献给所有那些像我一样相信绝对自由、相信人类通过性而得救的人。你是我的向导，我的启发者，你的能量就是我的能量。被你的话语电击一般激发，我投进你的怀抱，确信你那明察的贯穿会带来无限的享乐。让那些怯懦的恐惧远离我吧，那些恐惧使胆小者止步，也使那些在半路上被一切宗教异化的人止步；若不是在出生之初就已经如此的话。我赤裸地来到你面前，只以我的身体作为旗帜，把它献给你，如同你把你的身体献给我。而我们的拥抱不再是一种宽慰，甚至也不再是一种需要，而是一种最高意志的肯定行动，是对上帝的挑战，对这个令人作呕的幽灵的挑战；自从人成为人，并不幸亲手锻造出自己最粗鄙奴役的镣铐以来，它便系统地毁灭着人类。

你为这一声从你的喉咙、从你那主权的脏腑中发出，并写在这张被偷来、被卷起的纸上的至高呐喊，付出了多么昂贵的代价啊……二十七年的痛苦与自由匮乏，在那些可耻政权的地牢里；它们全都憎恨你、骚扰你、折磨你、摧残你，直到恐怖的地步，不仅剥夺了所有使生活变得温柔而愉悦的东西，甚至剥夺了呼吸天空空气的权利。这个丑恶的人类曾怎样死死咬住你不放啊！如今你自由了，已有两百年。真的自由了吗？你的灵魂，由你那享乐而受伤的肉体碎片构成，每当你的一本书被审查、被禁止、被毁坏、被付之一炬时，仍然感到人类不义的重量。它仍然受苦于你的想象一生都曾遭受的那枚马衔，甚至在你死后也仍如此。希望，你在一封我有幸读到的信中说，是一个不幸者灵魂中最敏感的部分。那么，这希望就是我，今天由我前来把它献给你，以它唯一可能的形式，爱的拥抱。正是通过这个拥抱，你终将看到自己从那座地牢中被释放出来，罪恶的人们还想继续把你贬抑并囚禁在那里；而我，也终将等待那唯有通过这种共融才能赋予我的自由。

因此我来到你面前，啊，多纳西安-阿尔丰斯-弗朗索瓦·德·萨德，你是一整块竖立起来、反抗那些为毁灭人类而建造的可憎幻象的深渊。我来到你面前，为获得我的自由。在那么多年盲目的漂泊、摸索、绕行、在谎言暴政下犯下错误之后，我终于觉得自己配得上你了。我终于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一切。我甚至不害怕。我自愿来到你面前，欢喜地冲进这座火山的火焰之中，在那里我将以我所有的火焰燃烧。

为此，我不得不摆脱一切成规、一切偏见，虔敬地遵循朱丽叶的方法，她的秘密。我的解放将通过性到来，通过你的性与我的性在彼此之中、同彼此一起爆裂，在一个连续体之中，空间与时间将在其中被废除，直到死亡随之而来。

但在此之前，我不得不准备自己，遵循朱丽叶的口授，她是至高女祭司，是一个人们尚未能形成观念的存在。而且，以她为榜样，我遵循了一种方法，我做了一次实验，我亲爱的朋友，这使我得以达到一种想象的狂想，那想象由你从它的镣铐和错误中释放出来。整整一个月，我不再从事淫乐之事，我

把自己投入平庸而使人麻木的事务，它们耗尽我，并要求我绝对休息。然后，日子到了，我独自躺下，在平静中，在沉默中，在最深的黑暗中。于是我召唤起我曾驱逐的一切，而它们依次逐渐呈现在我的精神中。我沉溺于重新创造那些迷乱；自太古以来，那些报丧之鸟就禁止我们接近它们。一个接一个，细致入微，随着它们呈现在我渴求的头脑里。随后我任自己滑向由轻柔触碰所生的慵懒，那些触碰刺激感官，唤醒想象。我命令我的意志不要约束自己，不要拒绝任何呈现在我幻想中的东西。而在这个幻想之室里，有些幻想反复出现；在这些反复出现的幻想之中，有一个强行占据了位置。而我没有用自己敏捷的双手去满足它，而是起身，把它记在这本册子里。然后我重新开始，另一个画面以闻所未闻的力量呈现在我面前。我把它接在第一个之后写了下来。第三次，我感到另一个念头向我而来，我又把它记录下来。我没有停留于任何道德考虑，因为，正如起初我曾从我的精神中抹去一切放荡的痕迹一样，我越过了自然与社会强加给我们的一切界限，好让最自由的场景呈现在我的想象中。它们就在这里了，终于，我的心，这些念头，以最黑也最红的墨水勾勒在这本册子的页面上；我也把这封信加在其中，现在我正高声读给你听，我是被献上的牺牲者，好让你把这里所记下的一切，用我、同我、在我身上、在我之下、在我之内，施行于我。

啊，你，唯一的至高存在，因为唯有你的意志与你的才华懂得越过自然与社会的一切边界；这里是我最秘密的欲望，我来向你索取我应得之物。请你想象所有这些插曲，再按你的幻想添上你想要的那些，然后让我们一起犯下那些最适合我们的行为。让我从空无进入过度吧，我如此亲爱的多纳西安，我所崇拜的、我所敬奉的，帮助我固定并物质化我欲望中不可把握的形式。我会懂得满足你的欲望。或者死去。并且死去。因为在我们的越界尽头，我们必须放弃话语，让自己滑向一种清醒的临终挣扎，在最致命的反讽印记之下。

继朱丽叶之后，我们将这样激怒美德，我们将摧毁人类历史上最有害、最致命的建构。被关在这座城堡里，这个由你为我们色情角力的上演而选择的封闭而孤绝之地，我们的拥抱、我们的喊叫、我们的享乐将使天地战栗，使共犯的野兽嚎叫，使树木和灌丛在我们震颤之风中振动，使反叛的水流依照我们嬉戏的流动形象而颤栗，使死者颤抖；他们是渴求复仇的侍从，要向这个会诱哄、会安抚、会造假的上帝复仇。

我不是作为母亲、妻子、女儿或娼妓来到你面前。我来到这里，摆脱了一切性别范畴的束缚，作为一个具有个体意志并以其意志反抗那些早已被强加太久的成规的存在。我一直听人谈起你对女人的蔑视。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你所蔑视的，在女人身上，是我已经从中解脱出来的东西，是所有那些她被限定其中的角色；而正是作为一个以身为个体为傲的人，我今天请求你与我结合。

女人的命运有两种：要么被一个大男子主义社会击倒，那社会消费她们，靠着使她们屈从于奴役性任务而用自己的火焰吞噬她们；要么就是最激进的不服从。我选择了反叛，并意识到自己立刻进入了堕落女子的阵营。而我之所以更加被憎恨，是因为把我带到那里去的并非不利的社会处境，而是一种坚定而凶猛的意志。堕落而神魂颠倒，我要求承认这些称号，把它们当作同样多的品质（我们避开“美德”这个词，不是吗）掷向那些侮辱我、蔑视我、把我叫作小娼妇、女骗子、女乞丐或娼妓的人。经由我回掷到他们嘴脸上的这些词，在对其意义的完全承担中，变成了带有野蛮性、带有欢欣的投射物，构成对胆小者、刽子手和暴君的最好还击。

而为此，我再一次追随了你的朱丽叶那不可磨灭的足迹，我为自己配备了一套毫无漏洞的哲学。我从我的性格中驱除了女性的轻浮，并按照你的原则塑造它、雕刻它。我是放荡者；我学会了成为放荡者，因为放荡是一门必须通过实验才能获得的科学。我是一个女放荡者，但像你一样，我的多纳西安，我不是罪犯，也不是杀人者。我爱性交。我把它作为我的力量，我最具颠覆性的武器，因为对于一个被堵住嘴的社会来说，没有什么比性高潮的喘息更有害。但我为自己锻造了一个强有力的灵魂，对性交的嗜好无法使它迷失；因此，正如朱丽叶像霍布斯、像孟德斯鸠那样思考和说话，我也像尼采、像巴特那样思考和说话。所以我来到你面前，作为一个具有知识的存在，而这种知识在一切方面都与良知相反。因为良知不过是自由之敌强加的负担，是一种异化教育所灌输的成见的产物。但我在这里不过是在重复你放进令人赞叹的德尔贝娜口中的话语，而这些话语构成了你的信条，也就是我的信条的一部分。

我不是作为处女，带着一种你和我一样蔑视的贞洁来到你面前。况且，我要向你托付我的第一个秘密，因为我会在这些倾诉时刻把它们全都向你揭开，而只有共谋且平等的情人才知道这样的时刻。我从未是处女。我生来没有处女膜。仿佛自然在塑造我之前就已明白，没有必要把这道可笑的障碍加在我那感受并品尝快乐的巨大能力之上。因为一切和所有人都可能使我狂喜，首先就是我自己，我的身体乃是我主要的享乐机器。

我们的爱抚将穿越未知的土地，我们的勃起将超出一切可量化的尺度，我们的肢体将倍增到不可计数，我们的开口将接纳奇异的有机器具，我们的液体将四处流淌，形成野性的激流，我们的快乐将抵达难以置信的顶峰。在我们的身体完成了连诸神也发明不出的姿态之后，我们的淫液将结合；这股共同的、双重肥沃的喷流，与被阉割者那些不育的液体相反，诞生于人类所知最绝对自由之中完成的一次行动，它将喷涌而出，以一种新的种子淹没世界。

这种种子就是朱丽叶自身携带的萌芽，也是我们携带的萌芽，凭借我们的狂怒本身，凭借我们的不服从，凭借这门从我们脏腑中诞生、在你的著作中也在这封信中物质化的自由哲学；我们将用它不可抹除的实体，签署一个新人类谱系的出生证书，它终于从一切镣铐中解放出来。

但我们将不会见证这一新的、经更新的人类族类的复兴，因为我们将完成至高的罪行，即把我处死。你是活着的，因为你的灵魂在那里，全然由物质构成；你在那里，而我正是对你说话，在我们融为一个单一存在之前，穿过我们的头脑能够发明、我们的身体能够完成的一切可能与不可能的形式，在像从未有任何人享乐过那样享乐之前；除了朱丽叶，但她是并且仍将是，不是吗，你那狂热想象的果实，永远无人能及（以至于让某些萨德派人士怀疑她的女性本性）。

而作为活生生的雄性，在你的舌头在我的阴蒂上颤动将在我身上引发的种种狂乱之后，在我将从你的肉茎鲜活而反复的冲击中得到的不可思议的快乐之后，在你肿胀的性器将从我的喉咙里攫出的断续叹息之后，你将用你的精液淹没我，这是一种孕育新人类的液体，却对我、对莉迪亚而言是真正的毒药；我无法成为母亲，无法忍受女性自然的奴役，并且我将在你那双臂中吐出最后一声喘息；那双臂，是我在生命中那么多令人目眩的夜晚里想象出来的，而我将把这生命献祭给你。爱人，在我们的交合之前，在我们相互耗尽之前，请收下这封以我的血签署的信。在我同我的创造者进行最后而至高的拥抱之前，因为没有他我就无法存在；他就是多纳西安-阿尔丰斯-弗朗索瓦·德·萨德，萨德侯爵，

坠落人间以把人类从其奴役和锁链中解放出来，为了使我成为可能而来。在你，我的多纳西安，和我，莉迪亚，幸福地，我们无所不知的性器彼此缝合，开始伟大旅行之前，走向我们的物质在那唯一合法的母亲之中的最终溶解，而她容纳着我们所有人。

莉迪亚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让·阿卢什在巴黎从事精神分析。自 1962 年起，他跟随雅克·拉康（拉康也曾是他的分析家）的研讨班；巴黎弗洛伊德学派解散之后，他参与了杂志 *Littoral* 的最初创办，随后参与创立拉康精神分析学派。通过他在 Epel 主持的“现代情色学大经典”丛书，他致力于在法国介绍来自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领域的学术研究。他曾以萨德为题写过一篇随笔，*康德的那个，萨德的个案*（*Ça de Kant, cas de Sade*，Cahiers de l’Unebévue，2001）。他近期出版了 *拉康之爱*（*L’Amour Lacan*，2009）以及三部曲 *神圣干预*（*L’Ingérence divine*），其中第三卷 *一个没有彼岸的女人*（*Une femme sans au-delà*）刚刚问世。这些书已被译成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

安东尼·卡萨斯·罗斯1972 年出生于加泰罗尼亚。他在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 *阿尔莫多瓦定理*（*Le Théorème d’Almodovar*）、*浪漫主义去死*（*Mort au romantisme*）、*谜*（*Enigma*）和 *最后革命编年史*（*Chroniques de la dernière révolution*），并在 Christophe Lucquin 出版社出版了 *缓慢*（*Lento*）。他的书被译成六种语言。他曾入围首作小说龚古尔奖决选，入围短篇小说龚古尔奖决选，并在西班牙获得首作小说 Syntagma 奖。他曾为 NRF 杂志和《解放报》（*Libération*）撰稿。

勒内·德·塞卡蒂著有约三十部小说（*陪伴*〔*L’Accompagnement*〕、*爱*〔*Aimer*〕、*看不见的客人*〔*L’Hôte invisible*〕、*拉斐尔与拉斐尔*〔*Raphaël et Raphaël*〕）、随笔（*黑色忧虑*〔*Noir souci*〕、*一种放弃*〔*Un renoncement*〕、*我在巴黎的阿根廷人*〔*Mes Argentins de Paris*〕）和传记（*帕索里尼*〔*Pasolini*〕、*维奥莱特·勒迪克*〔*Violette Leduc*〕、*卡拉斯*〔*Callas*〕、*莫拉维亚*〔*Moravia*〕），由伽利玛、瑟伊、弗拉马里翁及其他出版社出版。他是瑟伊出版社编辑，也是意大利语译者，并与中村亮二合作翻译日语。他也为戏剧和电影写作。他曾以萨德为题写过一部随笔，*洛尔与朱斯蒂娜*（*Laure et Justine*，Lattès）。

诺埃尔·夏特莱，大学教师兼作家，四十多年来通过随笔、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围绕身体问题展开独创性的思考，其中包括 *贴身烹饪，嘴的故事*（*Le Corps à corps culinaire, Histoires de bouches*，短篇小说龚古尔奖）、*罂粟女人*（*La Femme coquelicot*）、*头朝下*（*La Tête en bas*）、*伊莎贝尔之吻*（*Le Baiser d’Isabelle*）、*乔治夫人*（*Madame George*）……她的一些小说已被改编为戏剧和电视剧。*最后一课*（*La Dernière Leçon*，高中生雷诺多奖）正在改编为电影。在她的文本中，有多篇涉及萨德：*侵犯体系*（*Système de l’agression*，Aubier-Montaigne，1972）；为 *朱斯蒂娜或美德的不幸*（*Justine ou les Malheurs de la vertu*，伽利玛，1979 和 1994）所作导言与注释；*与萨德侯爵访谈*（*Entretien avec le marquis de Sade*，Plon，2011）。

安娜·库德勒兹是巴黎的大学教师。她的博士论文分两卷出版：*十八世纪的泪水之味*（*Le Goût des larmes au XVIII^e siècle*，PUF，1999，Desjonquères 再版，2013）和 *十八世纪对悲情的拒绝*（*Le Refus du pathos au XVIII^e siècle*，Champion，2001）。她合编了一卷关于 *萨德与女人：在别处，以别样方式*（*Sade et les femmes : ailleurs et autrement*，L’Harmattan，2013）的文集，并即将在 Champion 出版一

部关于 *萨德，多形态作家*（*Sade, écrivain polymorphe*）的随笔。她关注十八世纪以及当代文学中的自我书写，也关注今日对启蒙时代的再现。此外，她还是作家，出版过 *如同与一个女人*（*Comme avec une femme*，MJW Fédition，2010）。她也是短篇小说作者，作品发表于 *目光之声*（*La Voix du regard*）、*新文集*（*Le Nouveau Recueil*）和 *文学时刻*（*Les Moments littéraires*）等杂志，她在后者主持文学专栏。

卡特琳·居塞自 1990 年以来在伽利玛出版了十一部长篇小说，其中包括 *简的问题*（*Le Problème avec Jane*，2000 年《Elle》女读者文学大奖）、*对家庭的恨*（*La Haine de la famille*）、*光明的未来*（*Un brillant avenir*，2008 年高中生龚古尔奖）和 *靛蓝*（*Indigo*），并在 Mercure de France 出版了一部叙事作品 *纽约，一个周期的日记*（*New York Journal d'un cycle*）。她曾就读于高等师范学校，并获古典文学教师资格会考，她曾在耶鲁大学教授十八世纪文学十二年，并出版过一部关于放荡小说的论文，*快乐的小说家们*（*Les Romanciers du plaisir*，Champion，1998）。自 2002 年以来，她专事小说写作。她与丈夫和女儿住在纽约。她的第十一部长篇小说 *一种天主教教育*（*Une éducation catholique*）刚由伽利玛出版。

塞巴斯蒂安·杜宾斯基1963 年生于巴黎。他使用双语，以法语和英语写作。他在法国、英国和美国出版过长篇小说和诗集。他目前与妻子和两个孩子住在丹麦奥胡斯。他最近出版的小说有 *王国之火*（*Le Feu au royaume*，L'Écailler，2012）、*巴比伦三部曲*（*La Trilogie babylonienne*，Joelle Losfeld，2011）和 *是谁？*（*Quién es* ?，Joelle Losfeld，2010）。

阿兰·弗莱舍是作家、电影导演、艺术家和摄影师，Fresnoy 国家当代艺术工作室的创始人兼主任，著有约五十本书（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随笔）和约 350 部影片（虚构长片、实验电影、艺术纪录片）。他的艺术作品经常在法国和国外展出。他曾为美第奇别墅驻留艺术家，并获罗马大奖。他最近的书 *萨德，剧本*（*Sade, scénario*）是一部对话体叙事，2013 年由 Cherche-Midi 出版，基于一个被放弃的电影计划，该计划本要把神圣侯爵的角色交给马龙·白兰度；在他看来，萨德的一生如同"一部冒险与风俗小说，情色与喜剧小说，流浪汉与政治小说，社会与历史小说"。

娜塔莉·埃尼克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社会学家。除众多文章外，她出版了约三十部著作，被译成十五种语言，主题涉及艺术家与作者的地位（*凡·高的荣耀*〔*La Gloire de Van Gogh*〕、*从画家到艺术家*〔*Du peintre à l'artiste*〕、*当代艺术的三重游戏*〔*Le Triple Jeu de l'art contemporain*〕、*成为作家*〔*Être écrivain*〕、*艺术家精英*〔*L'Élite artiste*〕、*艺术化*〔*De l'artification*〕、*当代艺术范式*〔*Le Paradigme de l'art contemporain*〕）；处于危机中的身份（*女人状态*〔*États de femme*〕、*伟大的考验，母亲—女儿*〔*L'Épreuve de la grandeur, Mères-filles*〕、*女性解放的矛盾心理*〔*Les Ambivalences de l'émancipation féminine*〕）；社会学史（*诺贝特·埃利亚斯的社会学*〔*La Sociologie de Norbert Elias*〕、*艺术对社会学做了什么*〔*Ce que l'art fait à la sociologie*〕、*艺术社会学*〔*La Sociologie de l'art*〕、*为什么是布尔迪厄*〔*Pourquoi Bourdieu*〕、*社会学家的蠢话集*〔*Le Bêtisier du sociologue*〕）；以及价值（*遗产的制造*〔*La Fabrique du patrimoine*〕、*论可见性*〔*De la visibilité*〕）。

皮埃尔·茹尔德是小说家、文学批评家和格勒诺布尔第三大学法国文学教授。他出版了约四十部著作，其中包括 *想象地理*（*Géographies imaginaires*，1991）、*没有肚量的文学*（*La Littérature sans estomac*，2002）、*失落之地*（*Pays perdu*，2003）、*怪物文学*（*Littérature monstre*，2008）、*黑色天堂*（*Paradis noirs*，2011）、*绝对元帅*（*Le Maréchal absolu*，2012）和 *第一块石头*（*La Première Pierre*，2013，让·季奥诺大奖）。

莱斯利·卡普兰1943 年出生于纽约，她在巴黎的一个美国家庭中长大，以法语写作。在学习哲学、历史和心理学之后，她在工厂工作两年，并参与五月风暴运动。她的第一本书 *过度—工厂*（*L'Excès-l'usine*）于 1982 年出版。她的作品由 POL 出版社出版，并被译成十来种语言，包括叙事作品和长篇小说（尤其是 *天空之书*〔*Le Livre des ciels*〕、*罪犯*〔*Le Criminel*〕、*布鲁克林桥*〔*Le Pont de Brooklyn*〕、*从现在起—无名小姐*〔*Depuis maintenant-Miss Nobody Knows*〕、*精神分析家*〔*Le Psychanalyste*〕、*发热*〔*Fever*〕、*千层酥*〔*Millefeuille*〕……）、一部片段式自传（*我的美国始于波兰*〔*Mon Amérique commence en Pologne*〕）、随笔（*工具*〔*Les Outils*〕以及网站 lesliekaplan.net）、戏剧（*我一生都是女人*〔*Toute ma vie j'ai été une femme*〕、*露易丝，她疯了*〔*Louise, elle est folle*〕、*移动天空*〔*Déplace le ciel*〕）。莱斯利·卡普兰是 *Trafic* 杂志编委会成员。

阿德里安·拉罗什是生于巴黎的法国作家。曾就读于高等师范学校，他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随雅克·德里达完成并答辩博士论文。继 *最后的热内*（*Le Dernier Genet*，随笔，Champs Flammarion，2010，获费米娜最佳随笔奖提名）以及由 *孤儿们*（*Les Orphelins*，J'ai Lu，2005）开启、随后有 *异端者们*（*Les Hérétiques*）和 *归还*（*La Restitution*）（Flammarion，2005，2009）的小说三部曲之后，拉罗什继续他关于孤儿之人的经验与概念的探究。插图随笔 *杜尚废料*（*Duchamp Déchets*）将于 2014 年出版（Éditions du Regard），长篇小说 *谁在那里！*（*Qui va là !*，Rivages-Actes Sud）将于 2015 年 1 月问世。

埃尔韦·卢瓦什莫尔生于阿尔及利亚穆斯塔加奈姆。在贝桑松求学期间，他同时接受保罗·莱拉的教学，随后进入斯特拉斯堡国家剧院学校。起初担任皮埃尔-艾蒂安·海曼和安德烈·施泰格的助理，后来在弗朗索瓦·罗谢克斯领导下于卡鲁日剧院成为导演。他排演过皮兰德娄、契诃夫、卡尔德隆、贝尔、茹尔德伊、穆勒、盖努恩和伊夫·拉普拉斯的作品，并与后者经常合作。他曾在多所学校任教（圣艾蒂安、斯特拉斯堡、洛桑和日内瓦）。在成为费尔内-伏尔泰"欧洲客栈"的艺术总监之前，他创建了 Châtelard 剧院。他是 FOR 剧团的创始人。在他最近的导演作品中，可以举出让·塞纳克和米歇尔·贝雷蒂的 *我们处在一个神奇宇宙的边缘*（*Nous sommes à l'orée d'un univers fabuleux*）、莱辛的 *智者纳坦*（*Nathan le sage*）、*犹太人*（*Les Juifs*）和 *明娜·冯·巴恩赫尔姆*（*Minna Von Barnhelm*）、伊夫·拉普拉斯的 *老实人*（*Candide*），以及奥利维耶·皮和迈克尔·雅雷尔的 *夜之齐格弗里德*（*Siegfried nocturne*）。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他执掌日内瓦喜剧院，并将在那里于 2015 年执导莎士比亚的 *李尔王*（*Le Roi Lear*）和萨德的 *法国人，再努力一次*（*Français encore un effort*）。

弗朗索瓦·奥斯特，法学家兼哲学家，在布鲁塞尔和日内瓦任教。他是比利时皇家科学院成员、欧洲法理论学院院长，把自己的法哲学思考置于"法律与文学"潮流之中。他尤其出版过 *萨德与法律*（*Sade et la loi*，Odile Jacob，2005）和 *最长的一夜，萨德与波塔利斯在断头台脚下*（*La Nuit la plus longue, Sade et Portalis au pied de l'échafaud*，戏剧，布鲁塞尔，Anthémis，2009）。

克里斯蒂安·普里让1945 年生于圣布里厄。在罗马（1978-1980）和柏林（1985-1991）居留之后，他如今主要住在布列塔尼。他从 1969 年至 1993 年主持先锋杂志 *TXT*，出版了约五十部著作（诗歌、虚构作品、专栏、随笔），主要由 POL 出版，并经常在世界各地公开朗读自己的作品。近期出版的有：*现代生活*（*La Vie moderne*，诗歌，POL，2012）；*希诺的童年们*（*Les Enfances Chino*，长篇小说，POL，2013）；*DCL 马提亚尔警句*（*DCL Épigrammes de Martial*，翻译，POL，2014）。

弗朗索瓦·普里泽是画家和舞台美术家。1996 年，在费尔内-伏尔泰，应导演埃尔韦·卢瓦什莫尔，也即今日的日内瓦喜剧院院长之邀，他举办了一场献给萨德的展览，题为 *6 先生*（*Monsieur le 6*）。一部关于其作品的专著正在 AREA 出版社出版中。他对十八世纪抱有极大兴趣，并正着手撰写关于气球、革命前夕的法兰西喜剧院、卡洛纳珍奇陈列室的著作。他最近一次大型展览题为 *17 点 59 分*（*17h59*），于 2013 年在鲁昂圣旺修道院教堂举行。

卡特里奥娜·塞思是散文作家和大学教师，专攻十八世纪文学与思想史。她出版了多部著作，其中包括《国王们也死于此病。启蒙运动对抗天花》（Desjonquères，2008）、《亲密的制造。十八世纪女性回忆录与日记》（Laffont，“Bouquins”，2013）、《埃瓦里斯特·帕尔尼（1753-1814）。克里奥尔人、革命者、法兰西学士院院士》（Hermann，2014），以及拉克洛《危险关系》的“七星文库”版（Gallimard，2011）。

莉迪亚·巴斯克斯是西班牙巴斯克大学（UPV-EHU）法国文献学教授。她教授十七、十八世纪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并开设关于文学与图像、副文学以及文学翻译的研讨课。她将马里沃、克雷比永、卢梭、狄德罗、萨德、德诺斯、卡尔科、德尔阿莫、塔伊亚等人的作品译为西班牙文；她也是多部随笔的作者，其中最近一部论述《十八世纪的女性性高潮》（Himéros，2014），此外还写有情色叙事。

同社出版物

同一出版社出版

索菲·卡拉蒂尼

猎人的女儿

让-马里·谢费尔

文学研究小生态学。为什么以及如何研究文学?

米歇尔·维诺克

代际效应。法国知识分子简史

路易·德·马伊

塞伦迪普三王子的奇遇

后附 *塞伦迪普性之旅*

多米尼克·戈伊-布朗凯、玛丽-安娜·帕沃、奥德·沃尔皮亚克著

安德烈·阿加尔

花园里的一只蜥蜴

菲利普·拉金

冬天里的一个女孩

小说由多米尼克·戈伊-布朗凯与居伊·勒戈费从英语译出

带着一个洞的生活

诗选，由居伊·勒戈费从英语选译，德尼·伊尔松协作。双语版

埃里克·加尼耶

法国的同性双亲家庭。新型家庭之战

贝特朗·龙盖斯佩

做梦的时间实在很短

索菲·卡拉蒂尼

人类学中未说出的话

后附 *与莫里斯·戈德利埃的对话*

娜塔莉·埃尼克

失落的房屋

安娜-多菲娜·迪沙泰勒

闪电与蝴蝶

皮埃尔·乌迪翁

为害的艺术

卢卡斯·芒热

巴格达来信

穆斯塔法·萨富安

精神分析。科学、疗法——以及事业

科琳娜·德维莱尔

这是什么小说？

多米尼克·戈伊-布朗凯（主编）

致莎士比亚的信

尼科尔·罗森

我曾梦想着别的东西

法定呈缴

本书纸质版由位于梅尼勒-叙尔-莱斯特雷的 CPI Firmin-Didot 印刷完成。

法定呈缴：2014 年 9 月。

ePub 版本由
安娜·弗拉戈纳尔-勒冈和 LEKTI 制作

于 2014 年 10 月



http://www.editions-marchaisse.fr

封底

封底

两百年前，在沙朗通的一所精神病院里，那个其名字直到今天仍召唤着一种硫磺般想象的人死去了：昔日的萨德侯爵。

值此周年纪念之际，我们邀请我们的同时代人给他写信，迎接这样一种挑战：同这个超出常规、持续令人着迷并令人不安的人物展开一场来自墓外的对话。

阅读的回忆，责难，爱的信息或告别的信息，令人尴尬的问题……一切皆有可能，甚至被禁止的东西也可能，在这场充满享乐的通信中，作家与艺术家们向启蒙时代的大他者致辞，并由此以完全的自由，质询我们现代性的根基。

作者：让·阿卢什（Jean ALLOUCH）、安东尼·卡萨斯·罗斯（Antoni CASAS ROS）、勒内·德·塞卡蒂（René DE CECCATTY）、诺埃尔·夏特莱（Noëlle CHÂTELET）、安娜·库德勒兹（Anne COUDREUSE）、卡特琳·居塞（Catherine CUSSET）、塞巴斯蒂安·杜宾斯基（Sébastien DOUBINSKY）、阿兰·弗莱舍（Alain FLEISCHER）、娜塔莉·埃尼克（Nathalie HEINICH）、皮埃尔·茹尔德（Pierre JOURDE）、莱斯利·卡普兰（Leslie KAPLAN）、阿德里安·拉罗什（Hadrien LAROCHE）、埃尔韦·卢瓦什莫尔（Hervé LOICHEMOL）、弗朗索瓦·奥斯特（François OST）、克里斯蒂安·普里让（Christian PRIGENT）、弗朗索瓦·普里泽（François PRISER）、莉迪亚·巴斯克斯（Lydia VÁZQUEZ）。

卡特里奥娜·塞思（CATRIONA SETH）是十八世纪文学与观念史专家，大学教授、随笔作家。